摇篮与墓地

VISIT…

2 020 4804 2

摇篮与墓地

——严复的思想和道路

陈越光 陈小雅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特约编辑：包尊信

责任编辑：何昌宇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　　图：刘长顺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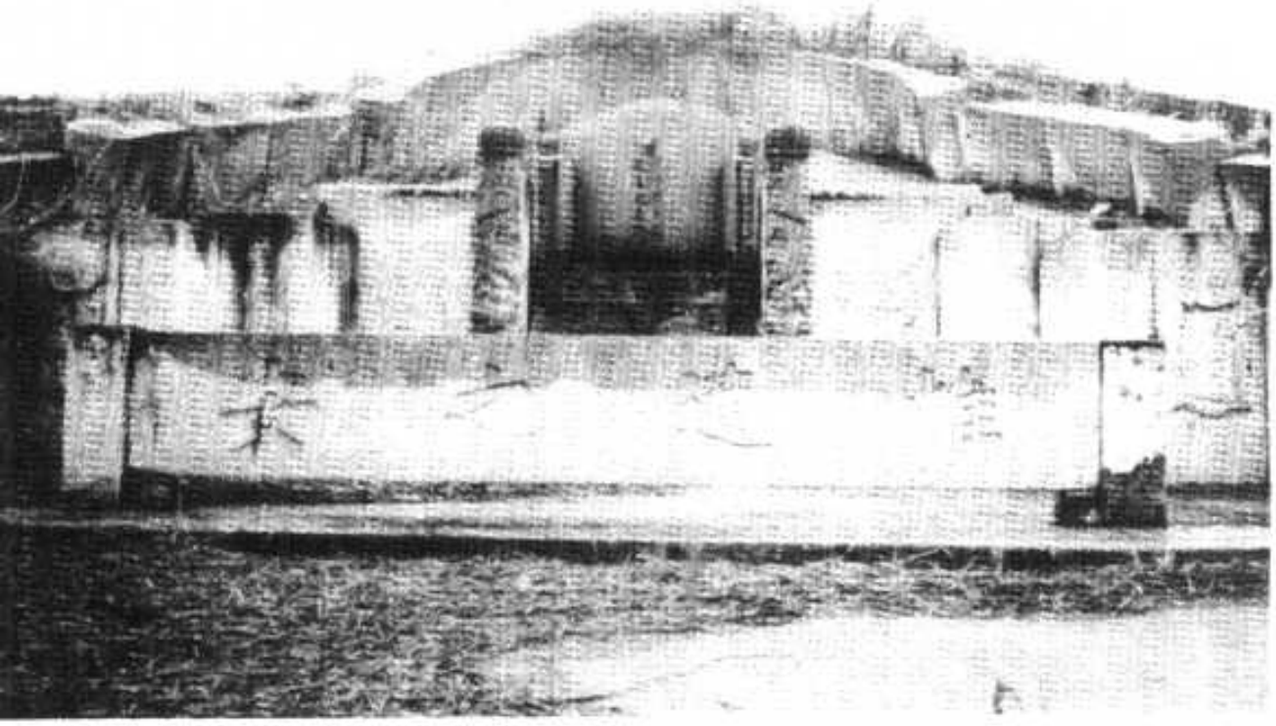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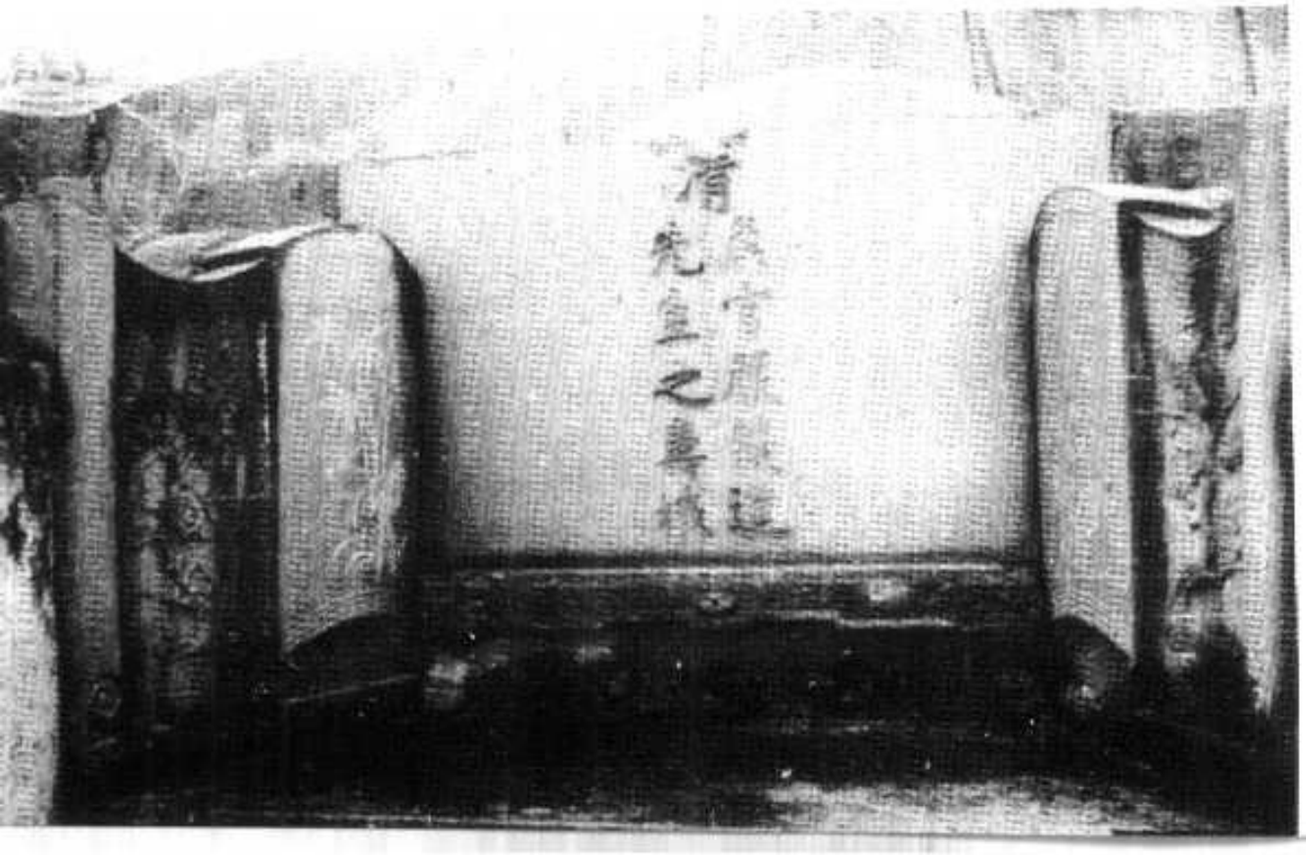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5.25　插页16　字数77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12　印数：1—57,500册

定价：1.10 元



严复墓全景

严复墓碑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

DZ29/48

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下，我们编辑了这套《走向未来》丛书。

她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页。

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巨大的灾难必然带来丰厚的果实；觉醒，总是从痛苦的黑暗中萌生的。

序

十五世纪末叶，当雄心勃勃的欧洲人踏上他们扩张和探险的道路时，一个崭新的主题便赫然显现在这个地球的历史中。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各古老文明的冲击，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产生了。当这种浪潮由西向东推进时，它遇到了东方一个最伟大、最古老、最优秀的民族……

中国，作为一个古典理想的化身，它独立于世已存在了两千年之久。怎样对待这种冲击？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碰到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似乎已在谈论着完全不同的题目了。但我们还常常在为几百年来激荡着世界的那个主题而激动。什么国门的开放啦、文明的借鉴啦、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啦、国魂

和遗产啦……等等。这并不是无病呻吟，因为我们无法跨越历史。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案头的书卷翻到一百年前，把目光投向那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严复。

严复的一生，背负着这个民族伟大而沉重的包袱，有过艰辛的探索和痛苦的失望，但也有英勇的战斗。他献身三十年的中国近代海军事业，成了洋务运动的殉葬品，但他翻译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著作，却成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启蒙的思想火炬。他，和他的一代人，为寻找拯救民族的良方，在自我批判中行进。虽然，他最后走上了自己青年时代所执着信仰的反面，被埋葬在那历史古老的墓地之中，但作为一代人，他们推动了历史前进，并留下了思想的珍贵果实。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徘徊在那墓木已拱的地方，企图在历史的灰尘中发掘历史的主题。

严复的名字象斑斓的历史星空中的一颗彗星那样吸引了我们，我们朝它走去。我们来到他的家乡，他的时代和独特的道路在我们眼前展现。我们拜访了对严复研究有素的王栻先生，向他求教；他带病和我们进行的长谈令人难忘。在本书的写作过

程中，我们还得到包遵信等同志的精心指导。现在，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指教。

作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于北京

编委名单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包遵信

副主编：金观涛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　焱　王小鲁　王岐山

王晓强　尹蓝天　包遵信　乐秀成

刘青峰　朱嘉明　朱熹豪　阮芳斌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唐若昕

贾新民　翁永曦　陶德荣　黄江南

童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目　录

序……1～3

第一章　在大时代到来时……1～29

1—1　莽莽神州，放诸中流……4

1—2　纷起应战的人们……14

第二章　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星火者……31～72

2—1　世纪的产儿……34

2—2　《天演论》……46

2—3　不灭的火种……62

第三章　永恒的命题……73～117

3—1　有共同规律吗？……76

3—2 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看待中华民族的独立……91
3—3 牛“体”安能有马“用”？……100
3—4 治“标”还是治“本”？……108

第四章 摇篮与墓地……119～154
4—1 暮色笼罩，送来哀思……121
4—2 伟大而沉重的包袱：专制——孔孟——民族的关系……126
4—3 从历史的灰尘中发掘历史的主题……149

第一章

在大时代到来时

感觉到周围大空虚的人是不幸的，假如从他的灵魂中不能升起一支有力的歌……

——罗曼·罗兰

当麦哲伦率领的船队绕过暴风的海角，风和日丽的太平洋象一个奇异的世界展现在这伙欧洲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人们的意识中才有了真正完整的概念。从此，东方和西方不再是绝对分离的了。历史，曾经以它的爆破方式冲破血缘纽带维系的部族群，踏破地域局限的奴隶制城堡，翻过中世纪骑士的墙垣，现在又越过了民族国家的屏障，把整个地球作为了自己的大舞台……

“你来了！”——古老的、骄傲的中国翘首而望：“我们似曾相识。可你的额上，为什么戴着荆棘的花环？”

1-1 莽莽神州，放诸中流

十九世纪被称为给人类带来文明的世纪。当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他们文明的收获来到中国这片神奇的大陆时，神州大地，仿佛还在它遥远的亚细亚梦想中沉睡。

不是吗？它的一八〇〇年，并不象一九〇〇年那样在炮火的灾难中降临。但是，按照自己的历史脚步，它的王朝已经走过了鼎盛时期，显露出某些“衰世”的征兆。这是一种在两千年漫长的道路上时常出现的征兆，它时起时伏、时隐时现，奇迹般地铸成了中华帝国大厦的一支画栋雕梁。这种周期性振荡，每隔二、三百年就有一次，汗牛充栋的历代文献不厌其烦地记载了它的每一次到来。什么政治领域中的官僚腐化、官僚机构膨胀；经济领域中的土地兼并、岁入减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王朝威信丧失、纲纪崩坏、官方意志失去指导作用……等等。这次仍是一样，大清王朝那存在了一个半世纪的官僚机器，不仅破旧松散，转动不灵，而且浑身锈迹斑斑，已经快要成为一堆废铁了。嘉庆年间的

虚收税粮案、冒领库银案、河工贪污案，表现了清帝国由上至下整个统治机器的腐朽。当时的官僚在未到任之前，先要计算一下这一官缺的“出息”若干？“应酬”若干？“可入己者”若干？一年中的“陋规”和“属员之馈遗”有多少？计算之后，如果大有“甜头”，才领凭上任①。在地方政权中，“州县有千金之通融（索取贿赂），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②的现象，几乎成为通例。官僚的腐化，行政效率的递减，致使官僚机构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应，是地方富豪疯狂的土地兼并。据记载，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拥有三千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很多，所谓“田多者或一家而占数甲（里甲）”③便是这种情形的写照。著名的大官僚和珅一家就占有土地八十多万亩。他被赐死时，籍没家财除无法估价的外，折银达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两之多④。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流为乞丐，当时仅北京一地就聚集乞丐十万人以上，嘉庆元年的一个寒夜，冻饿

①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
②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
③《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三，户政。
④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

而死者就达八千人之多。政治经济控制的失灵，带来封建纲纪的崩坏和儒家所标榜的道德的沦丧。趋炎附势，胁肩谄笑，成为升官发财者的必备品质。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曾说他的为官之道是：“但多磕头少说话耳。”①这时的农民起义，也已不象历史上一般王朝中期那样只反贪官，而是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和王权的象征——皇帝了。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的天理教起义，就在紫禁城隆宗门匾额上留下了它大不敬的箭头，迫使道光帝不得不下诏“罪己”。这种国家的危机，王朝的危机，一代知识分子志士仁人的苦闷，由龚自珍放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声。

但是，这种危机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危机，解救这种危机，使封建社会起死回生，幻想奇迹般地出现所谓“中兴”，也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题。这种王朝危机掩盖下的另一种危机，才是这个民族的真正危机；与这个主题交织在一起的另一主题，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题。

①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东来，西方的天际飘来了一朵黑色的云——鸦片。毒品的滚滚涌进，造成了白银源源不断的外流①——到了十九世纪这片黑云已压到了紫禁城的上空，困扰着这个已经腐朽了的王朝。这是历史大幕上的绳索，徐徐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史那沉重的帷幕。一八四〇年，推销阿芙蓉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稳定态被打破了。从此，中国民族踏上了一片充满痛苦与耻辱的历史沼泽地。八十年间，她遭受了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蹂躏；被迫签订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被割去了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偿付近十亿两白银赔款；失去了许多重要商埠、租界以及一系列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控制等国家主权②。民族被置于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的境地。

①据统计，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走了三至四亿银元。（参见《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②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天津条约》，又认可耶稣教、天主教、东正教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各帝国主义拥有领事裁判权和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一八九五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十二个重要地区。

这一次，古老的中华民族承受的不再是少数民族的铁蹄．她不能再次从这些野蛮的舞蹈中变得年轻起来①。在洋人炮弹的火光和鸦片的迷雾背后，她所经历的将是在世界潮流中痛苦挣扎、痛苦探索和痛苦更新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中国思想界“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自古以来祖宗遗传的深顽厚锢之根据渐渐摧落失陷”，政治学说、世界观方法论和伦理道德学说面临崩溃。但是，人们既愤于独夫专制，又无力组织新政体而代之；既鄙睨考据词章的庸恶陋劣之旧学，又未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风气；既厌恶三纲五常和压抑于虚文缛节的风俗道德，又没有新的社会伦理学说可树立。知识界向往着振兴中华、富国强兵的热血青年们，“犹如摩西之徬徨于广漠，阖庐之漂泊于泰洋”，惨淡经营，艰难跋涉。“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所谓两头不到岸者也。”②

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当汉族政权面临腐朽崩溃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曾象农民起义一样发挥调节作用。

②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

历史，给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个重大任务，这就是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主题，提供中国社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思想武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并不乏改革的人才和革新的主张。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社会，靠着这种强大的调节力量，它千百次地度过危难，挽救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但同时又消除了走向新社会的可能性，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所以，每当出现社会动乱，所谓衰世到来的时候，那些致力于社会政治改革的人，总是习惯地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到历史上去寻找革新的依据，从三代盛世、圣贤经传中寻找医国良方，整治社会的弊病。中国人这一"托古改制"的传统方法，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儒家道尧舜，道家称黄帝，墨家托夏禹；这个传统就象一个永远甩不掉的包袱，封建社会中那些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都把它一直背了下来。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清初的黄宗羲……他们改革的理想蓝图都是所谓孔孟"仁政"、"井田"，墨子"节用"，商（鞅）管（仲）"农本"和董氏

"大一统"，都要装到"三代"的套子里，似乎这样镀上金的光圈，才能给人们某种精神的满足。因此，他们的改革无不包容于封建制度宽大的袖袍中。他们的主张办法，虽然可能成为解救一姓一朝封建统治政权危机的强心剂，却没有给新时代的人们留下根本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当时代步入近代的大门，这种习惯于在动乱中"回头是岸"的老办法，再也不能满释我们民族的历史忧患，许多人感到茫然失措了。

这是一个在东、西流冲突、结合①中需要新的立足点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封建统治阶级中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封建顽固派的态度，他们或者

①我们把当日中国放在与几千年闭关社会的历史对比中，放在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去考察，这个环境背景，就是所谓东、西方文明冲突、结合的过程，我们简称为"东、西流冲突、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寻找世界市场的炮火声中揭开的。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由于这一接触，使殖民地"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同上，第1卷第252页）。在文化战线上，这个"新"与"旧"的斗争，毛泽东又曾把它概括为"中学"与"西学"的斗争（参见《新民主主义论》）。

为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思潮所席卷，视洋人如天兵天将，呜乎哀哉，惶惶不可终日；或则抱着“天朝上国”的信念，恪守所谓忠信礼义、华夷之辨、纲常名教、敬天法祖的教条。凡是他们认为与封建制度相违背的东西，凡是圣贤经传、祖宗成法中所没有记载的东西，都一概斥之为“异端邪说”、“奇技淫巧”，甚至说：“西人言日大不动，而八星绕之……窥其用心，止以欲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而已”。①“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②

另一种态度则是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开始着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解和调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做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工作。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产生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他们迫于民族危机和统治阶级地位的动摇，也感到“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

①曾廉《插庵集》。

②叶德辉《西医论·郎园书札》。

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① 希图以“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生一衅端”。他们看到了中国“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是因为国家贫弱，提出“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② 早期的改良主义者虽然也发表了所谓“采西学，制洋器，开商战，兴学校”的议论，但是仍以洋务派的追随者自居，以为孔孟道统是“天人之极致，性命之大原，亘千万世而无容或变者。”③

古老的中国在骤变的世界潮流中缓缓而动，黑暗紧紧地笼罩着大地。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民族自尊心遭到最惨重戕害的年代，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希望在哪里？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炬由谁高擎？历史的裁决是这样富于嘲弄的意味，它不是把自己托付给那些见到洋人就“以扇掩面”，在新的世界潮流面前死抱着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封建制度的遗老遗少，而是把命运交给

①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载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一辑，第268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③陈炽《庸书·自强》。

了那些在西方的压迫面前放开眼界，敢于喊出“师夷”口号的热血青年。因为中华民族希望的缆绳，不是维系在其传统的道义原则的朽木上，而是寄托在现实生存的双桨上。振兴的希望不可能来自对旧梦的重温；而只有痛苦地向敌人学习，才有着民族复兴的一线生机。

中华民族的命运之舟从深沉的黄河驶入了滔滔大海，是浮是沉？何去何从？

历史的经验失灵了，惶恐遍及神州大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正象鲁迅说的：这是一个进入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肩负黑暗，淌着鲜血，一线光明，前途未卜，或者死亡，或者全新，这就是大时代的前兆，大时代的磅礴气势！它决不是那些“鼎盛之朝”、“中兴之世”可以比拟的。

大时代来临了，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冲击着这块古老的大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这严峻的挑战面前奋起应战，严复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各派应战者的情况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可以说，直到严复以前，中国思想界所有的努力基本上都局限在传统的眼光和方法之中。严复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

时代的开始。

1-2 纷起应战的人们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场上，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军队与代表封建主的威灵顿的英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这一战，使拿破仑的名字在历史的天平上从此失去了份量，然而却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历史镜头：当法兰西的铁甲骑军向英方的圣约翰高地发起最后冲击，并霹雳般地一气狂奔到山脊最高处时，猛然间，前锋的战马在震撼山岳的呐喊中全部直立了起来——在他们和英军之间，一条深坑张着大口，直悬在马蹄下面！于是，整排整排的战马和骑士们坠入深坑，直到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填满沟壑，余下的人马才得以从他们身上踏过，冲向前去……

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从多方面昭示着人们，哪怕是一个细节，也是那样充满魅力，令人反复咀嚼，回味无穷。带着它的启示，当我们回首东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竟也是这样一个惊人相似的过程！

滑铁卢战役二十五年之后，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大决战开始了。但它与滑铁卢战役的不同在于，命运之神并不是在几小时、几分钟、乃至一刹那间一锤定音，而是足足徘徊了一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历史挑战的浪潮滚滚而来，而奋起应战的中华儿女们也象冲锋一样前赴后继，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青春年华，乃至热血、头颅，把横在中华民族前进路上的“圣约翰高地深坑”填平。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正是这样一批人，以他们的实践穿过王朝危机的薄雾，揭示出整个封建社会结构的危机，使探讨新道路的问题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来；并通过他们的失败，把人们向西方学习的目光，从纯技术引向科学，从科学引向体制，从体制引向方法论、世界观。于是，时代的主旋律才变得清晰、有力；后来的思想家才得以在这些先行者的经验的大树和失足的陷阱之间走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

被人们称作揭开中国近代史第一页的人——林则徐，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他比严复早出生半个世纪。与其前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四岁入私塾，七岁习作文，二十岁中举，此后便走入仕途。他所苦心追求的，是用什么办法医治大清王朝的疮痍，

上慰宸衷，下安百姓，使老朽的封建制度从气息奄奄之中恢复生气。他本人虽不是一个腐朽的官僚，但他却把年轻的热血和正直的精神献给了一个失去了青春活力的事业。他从一个翰林院编修、盐运使、按察使累迁至布政使、巡抚和总督，他为政清廉，虽遭同僚的冷目相视，曾产生过辞官的念头，但一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便“感刻难名”，决心忠君报国。最后，他为了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也为了这个他爱恨不能的朝廷，作出了为中外一切史书所共秉的禁烟大举。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译编了我国第一部世界各国辞典——《四洲志》，并委托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这一行为，在中国民族那沉睡了千年的充满着夷夏大防精神的铁壁上，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它们预告：中国人再也不能象自己的先辈们那样，到故纸堆里去寻找出路，而必须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呼吸一下大洋的空气了。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他花甲将至之时，迎接他的是伊犁的暴风雪，他一手经营的江东江南，竟成为《五口通商章程》下的一纸流水。到他六十六岁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力挽大清王朝衰亡的理想成了泡影，民族的危难、王朝的崩溃之势，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了。

“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希波克拉底语）

在林则徐抱恨终天的历史悲歌背后，时代的大提琴却奏出了另一曲更激越的音响。与前者不同，它不是对这个垂死王朝的哀挽叹息，而是施以暴力的扫荡。就在两广总督林则徐开始作禁烟努力的时候，生长在广东花县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正在准备重登科场。随着他的第四次落榜一起到来的，是中外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朝万古迷信的破灭，使洪秀全最后选择了他的“上梁山”之路。在林、魏编纂他们介绍西方的知识性小册子的同时，洪秀全正在着手改造那个他从西方借来的“上帝”，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继而，他掀起了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带有半古老、半西方，半政治、半宗教，半现实、半理想的大革命。但不论是上帝教组织那以上帝牌位取代孔子神像而“跪拜如常”的礼敬仪式①，还是那深得人心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政治、经济主张，都说明了这

① “其礼拜仪式，则因无正式的基督教师之指导，又无参考书籍及调查方法，乃由一己的意思参酌旧俗而行——在家中除去偶像或神位而代以纸书的上帝天父神位，跪拜如常，且仍然烧香烛元宝兼奉以酒食，与昔日之祭祀俗例无以异焉。”《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卷三。

场农民革命并不是为外来的宗教文化所唤起，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需要，使洪秀全把“上帝”变做了“钟馗”；呼唤出这场农民革命的真正原因，是一个行将崩溃的王朝的危机；而太平军心中的伊甸园，不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梦想。所以，洪秀全的事业无论何等波澜壮阔，都逃不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最终结局。

林则徐一腔赤诚的热血，洪秀全别出心裁的大胆创造，为这个民族注入了生存的希望。但是，从历史本身的逻辑看，不论是浩然正气的士大夫林则徐，还是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洪秀全，都不能摆脱历史的巨大阴影。他们分别代表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两种内稳定调节力量①。虽然，林则徐也看到了西方科技的作用，但他的双脚却踏在大清王朝的覆舟上；虽然，洪秀全也找到了西方宗教的武器（且不说这种武器究竟如何），但他用以维护和重建的，仍然只能是一个封建王朝。虽然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范文澜称林则徐是清代“开眼看世界

①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思想，封建士大夫的作用与农民起义的力量，均可成为中国封建大一统国家从动乱回到稳定的调节。（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的第一人”），但滚滚西潮，在林则徐眼里只是封建王朝在挽救危机中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在洪秀全眼里只是进行政治逐角的敲门砖。所以，他们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希望，只是天际的晚霞，而不是喷薄的朝日。当晚霞消失的时候，黑暗仍然统治着天空。

失败，告诉了人们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受到西方冲击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不只是一姓王朝。这座皇宫屋基的坍塌，是因为大地在震荡。一切有志于国家富强和革新现实的人，不是光凭着一片忠诚或反抗的勇气，就能真正找到处于复杂历史时期中的复杂文明的出路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人们辗转着，历史挣扎着。呼吸世界空气的人渐渐多了，走向世界的人渐渐多了，感觉到今天中国面临“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曾国藩语），“三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的人也多了。“日久因循，必至于决裂而不可收拾”的警钟敲响了，“天变人事，会逢其适”的思想方法也出现了。于是，一个办洋务的浪潮兴起来：买枪炮，造船只，开工厂，做生意，译西书，办报纸渐成风气。当然，许多人还囿于“中体西用”的观念，他

们的目光只在纯技术的领域里打转。

在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由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先辈们大不相同，又由于他们被封建意识陶冶得还不那么深，所以，在他们身上活跃着一股清新的朝气。他们终于从老一代知识分子群中分化出来，有的人走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有的人由办洋务转而办民族工业。数十年之后，他们终于汇成了一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不可忽视的力量。如容闳、徐建寅、张謇等，就是这样一些代表人物。

容闳幼年时，由于家庭贫苦，进入了美国人勃朗领导的一所在华学校。他的母亲靠着上山打柴换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儿子的学习。母亲最高的希望就是儿子将来能在英国人家里当仆人。一八四七年元旦刚过，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却在命运之神的引导下，乘Hun tress号帆船绕过了一四九七年才被发现的“大地之角”，朝着那块“新大陆”走去。一八五四年，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拒绝了要他当传教士的建议，也不打算留居异国。这位第一个留美毕业的中国学者，时刻关心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疾苦，向往着科学事业。对于他来说，玻璃仪器里的化学实验向他显示了一个全新的物质世

界，微积分激发起他对合理化的思考的追求，古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使他痛切感到专制制度缺乏道德基础。他立志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怀抱着这个志向，他回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祖国和母亲跟前。然而，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大清朝廷统治下的社会也没有可以实现美好意愿的条件。于是，这个接受过杰斐逊、林肯思想洗礼的新青年由广州至上海，由上海至南京②，力陈己见，希望其民主政治理想有所寄托。但几经落空后，他不得不找到曾国藩，落入洋务派彀中。在曾的支持下，他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并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这在当时被称作中国洋务运动的两椿大业。在他的事业遭受保守势力的疯狂反对而屡屡败北后，他才认识到“中国政体上的改革”是“不容稍缓之事”了。于是，他走上了康、梁变法维新的道路。

徐建寅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知识分子。他幼年随父在上海就学于外国人开办的“墨海书馆”，学习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23页。

②南京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权所在地。

并掌握了西方的数学、物理及外文知识。一八六二年，应曾国藩的招揽，他成了安庆军械所的制器之人。他积极支持父亲徐寿承担了中国第一台“皆由手造，不假外人”的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黄鹄”号的制造任务。他勤奋、踏实、聪明，有一股奋发图强的热情，又颇具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远见。上海编译局、格致书院，以及江南制造局的大规模研究和译述工作，就是在他倡议研究基础理论、“探索根柢，不受西人居奇”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经徐氏父子之手译述的科学著作，达二十余种之多。随着洋务运动历史局限性的暴露，在它内部酝酿的维新变法思想抬头。他以“道员”资格向总理衙门上万言书，主张派人到欧洲考察工艺技术和管理制度，并在领驻德国参赞衔期间，以一个内行人的目力考察了西方科技，找出了中国工业落后于人的要害在于“技术管理”和“研究试验”等方面。同时，他将自己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一卷刊行，表示了他赞成维新派开议院、行宪政的态度。在戊戌维新时期，随着谭嗣同等人入掌军机，徐建寅也充任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理”。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容闳避走他乡，老死异国；而徐建寅则在湖北汉阳“钢药厂”的一次爆炸

中失去了幸存的生命。在这里，出洋留学，科学救国，重视教育，翻译西书，容闳与徐建寅的合璧已有了严复的雏形。但是，科学在他们手里，还只是一柄匠人的凿子，而不是思想的火炬。

与容、徐略有不同的张謇，来自清朝同光年间的清流派①。他年过四十而大魁天下，取得了科场中的最高荣誉。可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终于放弃了自己追求半生的“状元宰相”的道路，走上了实业救国的艰难途程。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企业的挤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要发展，在当时不亚于绝路求生。为了筹措办纱厂的资金，他经常是“告急之书几于字字有泪”，“心口相商，笔舌俱瘁”，“每夕……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②在几乎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勉强把大生纱厂撑持下来。在维新运动中，他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两相配合，而后万事振兴的主张。后来他成了二十世纪初期席卷全国的立宪运动的主将。

以容闳、徐建寅、张謇为代表的三种人物，凭

①清末清流派以好议时政，标榜风骨，不避权贵自诩，是由一些“空言以博时名”的人物组成。

②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21页。

着自己的直觉呼吸到了时代变化的气息。他们又以出国留学、从事实业、教育和科技工作等各自不同的方式给这个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变化痕迹。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国”，是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硕果，都是结在“救国家”的大树上的。然而，这些慢慢长大的果实越来越感到缺乏阳光、水份和养料。于是，产生了变革土壤的要求。中日甲午海战，中华帝国败于东方岛夷，使先进的中国人幡然猛醒：救国家必须先改革国家。分别在教育、科技、商业和实业界的各种改革活动终于汇聚成一股汹涌的体制改革潮流。给十九世纪末期思想界和政治界以巨大影响的康有为，企图借中国传统思想的衣钵为这次革新建立一套理论体系，这使他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当然思想领袖。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十岁起，就随作为理学家的祖父诵读史书，抱定讲求“圣贤之学”的志向，人赠有“圣人为”的雅号。十八岁时投奔粤中大儒朱次琦，其学以程朱为主，间采陆王；治经则扫除汉宋门户，揉合今文经与古文经学，以“经世致用”为主。但他鄙夷程朱，对朱次琦异常推崇的韩愈也视之“肤浅”。他

主张讲“道”应当象庄子或荀子，讲“法”应当象管子或韩非子，体现了一种反“道统”的倾向。但是，社会剧变的刺激，时代风潮的影响，使他感到这些知识不足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在《自编年谱》中，他写道：“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究复何用？”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思苍生困苦”的青年人开始绝学捐书，闭门谢客，忽而欣喜而笑，忽而闷然而哭，虽然“求道迫切”，却又“未有归依之时”①。由于对长期沉浸其中的传统学术、思想、生活的怀疑和不满足，对人生意义的徬徨苦闷和无所皈依，所以，当一个意外的机会使他来到西人治理下的香港，目睹城市道路整洁，官室瑰丽时，就犹若找到了效法的榜样和批判的依据。从此，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当时中国社会仅有的几部西书中的知识。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一万一千多部西书中，康有为一人就购买了三千多部②。遗憾的是，这些翻译的西书中，没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4页。

②钟叔河《一个走遍世界去“尝百草”的人》载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有多少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书，绝大部分是适应“洋务运动”需要的工艺、兵法、医学、宗教等类书籍，其中少数是外籍传教士翻译的西洋历史和游记。但就是这些书，使这个闭塞于中国古老典籍中的青年人大开眼界，激发起创造的想象力。一部《环游地球新录》①，就对他十多年后主张“去国界”、“全世界置一总政府”的《大同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在他为培养维新志士而开设的“万木草堂”的讲学中，不仅设有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的课程，而且设有西洋哲学、群学（即社会学）的课程。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②。从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介到众星之世，他都杂然相揉，使他的学说具有明显的半中半西，不中不西的特色，人谓之“旧瓶装新酒”。这个特点，在其“公羊三世”的进化历史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论语注》中，他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

①此书为李圭一八七七年著，记录其一八七六年去美国游历的经过。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辑第117页。

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这就是公羊三世说关于“据乱——升平——太平”进化图式的康氏注解。

显然，从知识结构来说，康有为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旧式读书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被时代新潮流、新主题激动着而过早地封闭了自己的体系的人①。这使他不能完成为新时代提供新的世界观的历史重任。由于他是一个旧式读书人，所以他的维新理论自然要托孔子之名，张孔子之帜，②最终只能把西学作为材料，作为封建理论体系中反道统部分的补充；由于他过早地封闭了自己的体系，他便不能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更新自己的理论，弥补其不足，使之趋于纯熟，因而，他终究被历史淘汰了。

从哲学方法论来说，公羊派的学说是一种历史的进化论。这较之历史退化论（如相信唐虞盛世，以后则一代不如一代）或历史循环论（如五德终始之说）而言，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从政治思想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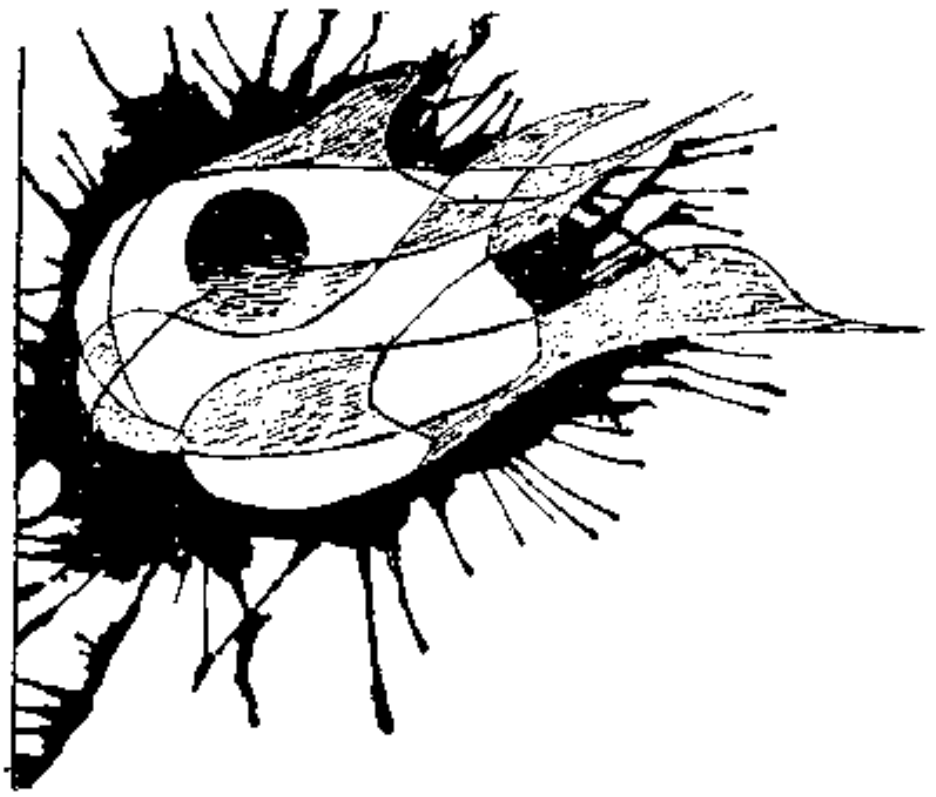
①康有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孔子改制考》就是这一意图的理论实践。

说，它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民主理论，是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的封建专制学说的对立面。在这两方面，康有为的学说可以说已构成了一种对当时社会具有革命影响的理论体系。然而康氏煞费苦心地从传统武库里找出来的维新理论武器毕竟太原始、太陈旧、太不科学了。那种“据乱——升平——太平”的历史进化图式，虽然是实行政治改革的一种理论依据，但它从根本上说，只是以三千年来处在闭关状态下的眼光看世界的产物。它不能形象地、科学地解释历史和这个时代人们面临的种种忧虑。他一方面在历史的进程中代表了进步，但又与一切过渡时代的思想一样，不得不带有旧时代思想深刻的痕迹。他的时代和思想方法使他不能认识到，他所要这个王朝克服和避免的危机，正是这个社会机体运动本身不可逆转的趋势。他思想中朴素的进化论方法论，在意识形态结构中，与中国原始朴素的民主政治思想，“兼爱”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历史上看，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补充。康有为的大半生奋斗，虽然在政治上开资产阶级革新的一代风气，但并没有实现他的夙愿——为这个大时代作好理论准备。

从林则徐到康有为，被这个大时代的各种使命感召着的人一批又一批地奋起应战。历史踩着这些台阶向前走去，一个世界观革命的序幕正待另一个人去拉开。

历史是寄情于未来的，就在林则徐死去的第四个年头，严复在林则徐的家乡诞生了。那时，前辈们所无力抗拒的时代风暴已席卷中国大地，历史的更剧烈的冲突正全面展开，一个大时代的雷鸣在沉睡的神州大陆震响了……



第二章

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盗火者

吾皇用剑征服者，我将用笔征服之。

——巴尔扎克

先行者的足迹在大洋潮水的激荡中泯灭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代青年儿女，于艰难困苦之中跋涉起步。

在开放了的世界中，需要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需要新的思想方法。历史需要这样一个人，他不再把目光投向延绵数千年的晦暗的古代，而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把目光投向开放了的世界，着眼于民族的未来。这种新型的世界观，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的自然科学水平上诞生的，它必须是近代世界自然科学的产儿。历史需要这样一个人，它不是移西方基督教理想之果于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之树的洪秀全，也不可能是身体力行投身

科技与实业的徐建寅和张謇。但是，他却是二者经验的接受者。他必须给从此以后的各个运动以思想启蒙。他之给予这个时代的，不是见诸于实物的，而是见诸于思想的贡献。他的奉献对于这个时代，对于该时代的政治生活、社会道德乃至学术理论来说，应该具有他的先辈们所不能比拟的重要意义。

历史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终于出现了。

2-1 世纪的产儿

一八五四年，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广东天地会起义之时，严复在福建侯官出生了。严复的父亲严振先是一个乡间儒医①，母亲是一个布衣的女儿，所以，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严复初名严传初，他从小读书用功，六岁起，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一类古书。这时，中国北方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事，我们的民族蒙受着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英法联军攻下津京，北京西郊的那座“万园之园”被焚毁了；继后，英国的势力又侵入我国新疆。一八六六

①旧时指儒生而行医的人。

年六月严复的父亲去世，全家四口（严复、严母和两个妹妹）全靠母亲做女红维持生计。不久，那个属于他的命运展现了。

这时的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刚刚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列强日益紧逼的形势使清政府和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欲从办洋务中谋求出路。于是，京师办起了翻译西学的同文馆。在严复的家乡，我国第一所造船厂——马尾造船厂也应运而生。这个船厂为了培养造船的“良工”和御船的“良将”，又分别设置了前、后两个学堂。一八六六年冬，学堂贴出了招取免费生的广告，这给窘于家境拮据，急于谋出路的严复带来了一线希望。他决计投考这个学堂，把生命献给拍打着他家乡土地的日夜汹涌的波涛。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碰巧这次考试的作文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刚刚遭值丧父之痛的严复有感于怀，于是写成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使他在考试中名列第一。于是，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人被录取了。自此，他改名严宗光，字幼陵，娶妻王氏，俨然以一个成人的姿态，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的人材行列。

严复就学于传授驾船技能的“后学堂”。这个学堂以英国教育为蓝本，设有英文、算术、几何、

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科目。也读些《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文理。这与当时一般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完全两样。四年以后，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十八岁那年，他登上了刚从普国购回的新式帆船“建威”号，与同学一道，到新加坡、槟榔屿、直隶湾和辽东湾一带实习。后又到船厂自制的“扬武”舰上，巡历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日本也正在首创海军事业。一八七四年，日本海军借故在台湾挑起战端，严复又随总理船政大臣、马尾船厂和艺童学堂的创建者沈葆桢奉命巡视台湾，测量台东各海口，调查军事情形……

一八七七年三月，严复一行人坐上了去欧洲的轮船，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从东海、南海、印度洋到古代文明的另一摇篮——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到大西洋，严复绕行了半个地球，登上了英国本土。当时的英国，正经过工业革命，处于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继海上霸主西班牙之后，这个只有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领有了居其本土一百五十倍之多的殖民地，成了世界的头等强国。在英国首都伦敦，犹如“踞地顶以览八极”，可以领略

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文化、政教以及一切最新思想。从这时开始，严复在这类似于自己家乡的海洋性温带气候中，度过了两年的留学生活。他先在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业，随后进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在该校，他念完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考课屡列优等”。留学期间的严复，已充分显示出他不同于其他同伴的才华，在政治见识和批判能力上犹为见长。清政府派驻英国使节郭嵩焘对他十分爱悦，总是另眼相看，但同时也觉得他“气性太涉狂易”，虑其“终必无成”①。确实，留学生活中耳濡目染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的成就，使得严复已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大清王朝的“良将”了。他学习的两年中，从未上过军舰实习，却曾到过英国的法庭“观其听狱”②。他也曾到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故乡——法国游历。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学说。而在

①《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六月十七日，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法意》卷一一，页八。

这些思想家的学说中，使英国和世界为之震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决定了严复一生对历史的最高贡献，使他在十六年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震惊朝野，唤起一代新人。

一八七九年，严复学成归国，在马江船政学堂做教员，改名严复，字几道。然而，这位身上携带着普罗米修斯火种的人所面临的命运却与二十四年前的容闳相差无几。以才学和人事关系而论，他本来很有希望跨上洋务派的马鞍，从办军工而谋求个人的前途。可是，就在严复回国的当年沈葆桢死了，他手中的本来已形成与北洋海军分庭抗礼的势力和罗致的人才，一并落入了李鸿章手中。严复自然也就转而与李鸿章发生了主属关系。他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天津水师学堂总办（校长）。官场的黑暗，封建衙门把持下的洋务运动的艰辛和个人抱负的矛盾，使他没有看到国家前途和个人发展的丝毫曙色，相反，自己却有被官场的腐朽黑暗吞噬的危险。“四十不官辜比，男儿怀抱谁人知！”①就在这个时候，他染上了可怕的鸦片瘾。这对于当时一般的官绅知识分子来说，似乎

①《愈壄堂诗集》卷上，页一《送陈彤甫归闽》。

是不足为奇的。而且，一种吞噬整个社会的黑暗，也可能吞噬它最优秀的精英。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幸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受了人文主义启蒙，已经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眼睛，又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来说，这毕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严复也曾想凭个人的才力另谋发展。他曾与王绶云投资创办河南修武县的煤矿。但是，和处在九死一生状态下的民族资本企业一样，它也得不到任何进展。这个时期严复复杂的思想矛盾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这就是他的科举梦。在一八八五、一八八八、一八八九、一八九三年，他先后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和总办（校长）的身份，辗转于福建原籍与顺天府之间，参加了四次乡试。然而，这些考试并不象他接触到的西学知识一样对他抱友好态度——他每次都名落孙山。

正在他痛苦、徬徨的时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向西方学习仅仅不到三十年的日本，竟然战败了中华帝国！北洋海军覆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消息传来，

“天下震动”，“举国廷净，都人惶骇。”①

中国人不能不感到震惊！这时是一八九五年，从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已历时整整三十五年。在一些人眼里，洋务派所自诩的大厦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赫然矗立：自六十至九十年代，先后兴办了大约二十个制造枪炮、船舰和弹药的工厂，仅马尾船政厂已造船舰三十四艘；江南制造局已建成一个综合性军工中心；一八八八年，一支远非旧式的南洋海军所能比拟的北洋海军建成，李鸿章就此宣称“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②已建成铁路四百公里；③一八八〇年创办的电报业，至一八八五年已有一万数千里电讯线路；④除了各种“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外，一八七二至一八九四年共兴办了一百多个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⑤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辑。

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2卷，第1—4页。

③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135页。

④《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163页。

⑤同上，第167页。

到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已没有外债，财政收支平衡，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每年还平均有四百万两盈余①……甚至连洋大人们也发出惊叹："我们对中国从一八六〇年的战争到一八九五年间猛迅的进步，实不能不感到惊异。"②《泰晤士报》在报道中国炮舰的一则消息中说：

"虽然这新式炮的口径和重量是少些，但是它们的力量是和射程远远地增加了，并在穿透力上比目前英国海军所拥有的最可怖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超过百分的十五。"③

然而，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④

难道为期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带给中国人的只是阳光下的海市蜃楼，背风处的沙器？！

---

①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86页。

②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辑。

③海尔《田鸟号航行记》，同上。

④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自强”破产了，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精华的北洋海陆军一触即溃，毫无拱卫畿疆与渤海门户的能力，最后全军覆没！“求富”也破产了，《马关条约》割地面积之大，赔款数量之多，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警醒了当时的人们，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个僵化腐朽的社会制度不变革，无论买多少枪炮，建多少船舰，盖多少工厂，都无济于事！如果不改革政治，中国即将灭亡！于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赴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举人联名上书大清皇帝，“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也。”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迅猛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① “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目睹国难人危，严复是这样的痛苦、愤慨。从一八九五年二月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公开放出了自己的悲声：他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论文，全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

大胆抨击中国两千年以来传统的专制政制，并指出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而改造今日中国的根本办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禁鸦片、废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所谓新民德，就是创立议院，废除专制。由此，严复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这一次，他从科举的梦中惊醒了，认识到了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时代。他开始了《天演论》的翻译工作，“未数月脱稿”①。从此“致力于译述以警世”②！

在十八世纪，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谐语：英国人控制着海洋，法国人控制着大陆，德意志人控制着天空。在这里，它并不是说德国有一支强大的空军，而是指德国的思想家统治着欧洲的精神世界。借用这个谐语来比喻当时的严复——从海军界转向思想界，他开始了由海洋到天空的重大转折，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严复的名字将要彪炳史书；这个期待和渴望思想家的时代，终于呼唤出她的发言人了。

在当时的维新派人物中，严复是唯一真正了解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②王蘧常编《严几道年谱》。

西方的。他不象康、梁，没有亲眼看到西方的文物制度，不懂得外国语言，不能直接阅读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著作，而只是凭借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宣传文字及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西方有关自然科学及技术方面的通俗读物，再加上在香港、上海所看到的市政管理，以构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片面印象。而严复十四岁就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二十五岁留学英国，广泛涉猎了西方第一流思想家的著作。他对西洋学问造诣之深，对西方社会了解之广，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可比，就是王韬、郑观应等辈，也都不能望其项背，最负盛名的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对严复也致其拳拳服膺之诚，他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身。"① 由于这一点，严复颇得清廷中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赏识。这也是他在"百日维新"期间进见光绪皇帝，面陈变法思想的资本。一八九六年，李鸿章创办"俄文馆"，命严复为总办。这一年，严复又协助张元济创办了通艺学堂，

①《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答严幼陵"。

并赞助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一八九七年，他本着“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①的宗旨，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它与《时务报》南北呼应，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两大论坛。

严复在维新活动中所表现的热情，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但是，他的特殊经历和造诣决定了他必须承担更重要的时代责任。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只能通过他的理性思维来影响政治，而一切实际的政治活动都只不过是他要奏出的主旋律的序曲与和声。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新政毁于一旦，留下一片瓦砾。中国改革的热潮就在这一片瓦砾前分道而行了。一些人，踩着瓦砾，踩着荆棘向前，掀起更激烈的高潮，于是有自立军运动，有革命党兴起；另有一些人，化为瓦砾下的潜流，企图悄悄地浸润这一块土地，于是有新思想的波涛，有“五四”狂澜。严复，正是这后一类人的代表。

一九〇〇年，在庚子赔款奇耻大辱的刺激下，

①严复《国闻报缘起》，见《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版。

严复毅然离开了他服务三十余年的海军界，专门从事翻译工作，以思想启蒙为职责。如果要解释严复这一行为的原因，除了洋务运动的惨重失败，国内政治局势和民气的变化外，在他一九一七年给《海军大事记》写的序中，还可以找到其思想的根据，他说："顾三十年前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从赫德的一席话中，他坚信自己找到了中国海军事业的"盛衰之故"，于是，他坚决地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2-2《天演论》

在论述达尔文进化论传入我国的意义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到此为止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是欧洲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以后逐步形成的。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应从一

五八三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算起。那时，将西方的诸如数学、物理、天文历法、水利等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个中国人，是明朝大臣徐光启（1562—1633）。这种似乎违背祖宗常训的行为虽然也遭到过反对，但由于它尚未构成对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威胁，所以并没有被最高权力机构所禁止。明清之际的政治动乱，打断了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后来又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这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著名论文中所分析的：“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①

中国人重新接触“西学”，只能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后的洋务运动算起。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接受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西书翻译工作。西方科学技术译著的大量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页。

出版，颇赖江南制造局之力。该局在二十余年间译书一百六十三种，另附刊三十二种，其中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一百零八期。由于对西学的认识尚需有一个过程，所以，译著中不仅人文科学不多，甚至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著作也不够重视。译著通常只侧重工业制造或与之直接关联的实用学科，除了外交几乎就是军事方面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才逐渐引进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古地质学、医学等基础、应用科学。

这类翻译工作，虽然对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毕竟没有起到从根本上摧毁旧世界思想体系的作用。引严复的话来说，这些工作和洋务运动对于整个腐朽的社会来说，仅仅不过是“一二补偏救弊之为”而已①。

在近代史上，严复也是以大翻译家的面目出现的，但他的名字，却刻在了“启蒙思想家”的不朽丰碑上。这是因为，传播西学与对待“中学”的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智慧的光芒，首先就表现在他译著的选择上。严复的翻译不仅在于

①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诗文选注》第16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严复译著和出版情况简目（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时　间	作　者	书　名	字　数（约）	出　版　简　况
1897年12月	斯宾塞	劝　学　篇		载《国闻汇编》第1、3—4册(1897.12—1898.1)
12月	赫胥黎	天演论悬疏		载《国闻汇编》第2、4—6册(1897.12—1898.2)
1898年4月	赫胥黎	天　演　论	50,000	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前有吴(汝纶)序、自序和“译例言”。
10月		天　演　论		由侯官嘻奇精舍石印出版，“译例言”部分删去“新会梁任父”字样。
1899年4月	宓　克	支那教案论	30,000	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1901年	斯宾塞	劝　学　篇		第一篇，由南昌读有用书之斋作为“侯官严氏从刻本”木刻出版。
1901—1902年	亚当·斯密	原　富	450,000	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前有吴序、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后附张元济、郑孝胥所作中西编年及地名人物物义诸表。

续 表

时　间	作　者	书　名	字数（约）	出　版　简　况
1902年	斯宾塞	群学(即劝学篇)		由杭州史学斋铅印出版。
1903年4月	斯宾塞	群学肄言	180,000	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出版。前有译序、译余赘语。
1903年9月	穆　勒	群已权界论	70,000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有自序，译凡例。
1903年		订正群学肄言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有高凤谦序，译序，译余赘语，后附译名表。
1904年1月	甄克思	社会通诠	100,000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有夏（曾佑）序，译序。
1904年	马孙摩栗思等	英文汉诂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有自序。
1905年	穆　勒	名　学	270,000	由金陵蒯氏金粟斋木刻出版。
	赫胥黎	天　演　论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删去“译例言”最后一段叙述出版情况的部分。
1906年8月	孟德斯鸠	法　意	450,000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续 表

时　间	作　者	书　名	字数（约）	出　版　简　况
1909年	耶芳斯	名学浅说	100,000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有自序。
1914年	卫西琴	中国教育议	20,000	载《庸言报》2卷3、4期。
	卫西琴	中国教育议		先后由天津庸言报馆和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5年		欧战缘起	10,000	据外国报刊消息和社论编译。载于《居仁日览》系送袁世凯阅览的资料，非卖品。
1930—1931年		严译名著丛刊		内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八种。各书均附有“译名对照表”。

数量之多，更在于选择之精。从一八九四年前后到一九一四年的二十年间，他先后翻译了密克的《支那教案论》，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余部著作。它们多是当时西方思想界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严复的译著，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在注释和序言中寄托了他改造社会的思想。从严复译著的范围看，博涉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他是完整地将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开创了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而《天演论》则是严复思想家历史地位的奠基译著。

一八九八年，严复投向中国思想界的炸弹终于引爆了。一本封面印有“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的赫胥黎氏《天演论》，象一道闪电，划破了思想界萤光点点的夜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它被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迅速地接受了，掌握了。他们急想传诵。有口皆碑。在《天演论》出版后十多

年间，曾发行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①。直到新学兴起，其盛誉历久不衰。小学教师往往拿它当课本，中学教师则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这无疑是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景象，也是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那么，《天演论》究竟是以什么精神如此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呢？让我们与读者一起，翻开那本小册子吧！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蓁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②

空间是如此的广漠，时间是如此的久远，悬想是如此的离奇，格调又是这样的清新。它富于历史感和哲理性，又充满散文诗的闲逸。这确实是当时那些沉溺在“时文”、“公牍”、“说部”之中的士大夫阶层见所未见的。就是在中国文坛上，也不曾有人以如此宏伟的气魄、持如此辩证的历史态度

①王栻《严复传》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②《天演论·察变》，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立论。更重要的是，在这本小册子里，用大量古生物、古地质学的科学成果，描绘了一幅与盘古开天地、女娲氏抟土造人说完全不同的物质世界进化图景：从遥远的古代至今，地球上的变化是缓慢的，于是就有所谓天地不变的观念产生。其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切，都是从那自古以来无穷无尽的变化运动中产生的。如果你觉得这是在耸人听闻的话，那么证据就在你的脚下。当你在立足处向下挖掘，到数丈深时，你将会看到蚌蛤一类海生动物的遗骸。这些遗骸并不是上帝为考验人们对它的信仰而埋在那里的，而是地球运动史上留下的实物例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在远古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天演论》告诉人们，即使人类能有“彭聃之寿”①，较之以亿数纪年的地球史，也是由暂观久，就象人们常说的“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一样②。这种变化交递，因条件而异，其来无始其去无终，但总趋势是“由简入繁，由微生著。”当前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动物，如

①即彭祖，老聃。据说彭祖生在夏代，“至殷时末已767岁”，老聃也相传特别长寿。

②《天演论·察变》。出自《庄子·逍遥游》。朝菌，是一种“朝生暮死”的植物，所以不知有晨夜的更替；蟪蛄是一种生长在夏季的昆虫，所以不知有春秋之演迭。

果追溯它的变异形态至最初，就可知它不仅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形态，甚至“莫定其为动为植”。①这种物种变化趋向，就是达尔文老人以他艰辛的探索所呈现在人类面前的那棵“生物树”。

那么，生物变化和留存至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再读下去，“物竞天择”出来了，“适者生存”也出来了，原来生物世界变迁的道理竟在这里！“特捆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②

读到此时，回头去看吴汝纶作的《序》，译者之用意便豁然开朗了：“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惜也。”

《天演论》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一八九三年在牛津大学罗曼尼斯讲座所作的演讲。题目全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一八九四年，赫胥黎为这篇讲演写了导论，并和其它三篇论文合编为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严复将该论文

①《天演论·广义》。
②《天演论·察变》。

集的前半部即“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讲演译为《天演论》。讲演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根本问题。在译作中，严复采用“达恉”即意译的办法，撰成“导言”十八章和“论”十七章。既介绍了原著的基本理论，又引进了斯宾塞“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思想，并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发挥了自己的看法。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警醒国人，阐明“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保群进化，与天争胜”等论点。这些崭新的语言，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确实开拓了眼界。

《天演论》的出版，带来了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但是，这一传播首先引起的并不是生物学和科学界的革命，而是整个思想界的暴风骤雨。这种情形，正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给欧洲带来的震动一样。因为它所论及的问题，针对着人们传统的宗教和信仰，其论点的战斗锋芒直指那千百年来无人敢于干犯的世界观领域。

正象哥白尼、伽利略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地位上贬谪下来一样，达尔文把人类从堕落的天使冰冷而孤独的地位上解救出来，使他们认识自己以及其与鸟兽的兄弟关系。地位仅次于天使的人类，本来自以为是从宇宙的中心俯视万物的，如今被宣告为只不过是地球上有机界发展锁链中的一环，而地球又只不过是围绕着千万颗恒星之一旋转的一颗小行星。于是，上帝分别创造万物的粗糙的教义被摧毁了。恩格斯就此写道："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① 达尔文是一位实现科学革命的天才，是打破庸俗思想的大胆的创造者。他向人们揭示了被神秘之幕笼罩着的进化思想，使它成为一种在知识界广泛流通的"货币"。同时，他的进化学说也奠定了他自己的《新约全书》的基础——这是一部关于人类进步的《圣经》。

用赫胥黎的话来说，达尔文"要我们跟着它走的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网丝织成的云路，乃是一座用事实砌成的大桥……这座桥可以使我们渡过许多知识界的陷坑，可以引我们到一个所在，那个所在没有那些妖艳动人而不生育的魔女——叫做'最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后之因'的——设下的陷人坑。"①进化论的确立，大大加强了自然界可以了解的感觉，并增强了那些把生命理论、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们的信心。所以，进化论——通过《天演论》——对当时正处于思想浅薄，学问饥荒之境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极好的科学启蒙。它奠定了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基础。从此，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家，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都曾把进化论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思想武器。进化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民族觉醒与沉沦的关口：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招来了德、俄、英、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清朝政府的腐朽不堪；变法维新的"公车上书"已经发出，小小的布衣人叩响了紫禁城森严的大门；改革已是"非西洋莫与师"②的趋势。在这个时候，严复将《天演论》公

①转引自胡适《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载《胡适文选》。

②严复《原强》，见《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诸于世，不啻在沸腾的民气中扔下了一颗燃烧弹。梁启超说："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①于是，它首先成了改良派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武器。梁启超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②。就是一向目空一切的康有为，从梁启超处读到该书时，亦承认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③。至如夏曾佑，更是"佩钦至不可言喻"。所以，《天演论》虽然发表在百日维新之时，但它在未正式出版前，就已誉满于主张维新的士大夫间，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不上几年，它便变成了一般救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名词，也便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了④。

《天演论》中所描绘的自然界"怒生之草，交

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

②杨复礼《梁任公先生年谱》，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辑。

③康有为《与张之洞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辑。

④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载《蔡元培文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

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昃日争，冬与严霜争”，“憔悴孤虚，旋生旋灭”，“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的景象，不正是数千年来在地球大舞台上种族斗争，特别是近百年来民族斗争的真实景象吗？“至如岛国孤悬或其国在内地，有雪岭流沙之限，则其中见种，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①的情况，不就是印度、波斯覆亡的写照，和中国这个闭关大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交锋中正面临的危险前途吗？而“鳏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的瞽说盲言，不正是对那种在变化了的世界潮流中仍恪守祖宗成法的守旧之人的尖刻讽刺吗？严复借物质世界生存竞争的理论，推及人事，得出“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的结论。他的敏锐，不在于看到了一些单个的事实，而在于透过这些事实看到了世界大势，从这些大势中推导出行动的方向，在《救亡决论》中，他说：“天下大势，既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继自今，中法

①《天演论·人为》。

之必变，变之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正是这些思想和论述，起了在戊戌维新时期及其稍后大开中国之风气的作用，它引导人们把眼光从这个古国移向世界，从三千年的"文物声明"移向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世界观。所以，梁启超说：进化论“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一新之者”。政治法制之变迁，宗教道德之发达，风俗习惯之移易，皆赖进化。“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此意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①

《天演论》就这样“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给人们“一种当头棒喝”，“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②这火是严氏从大西洋彼岸盗来的思想之火，它的发明者也许并不会想到，经严复之手，它点燃了中华民族热血男儿的心，它燃烧得那样炽烈，以至在短短的十年内，唤醒了这个沉睡的东方巨人。作为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胡汉民曾经说过：“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匪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

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饮冰室文集》。

②胡适《四十自述》。

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①

2-3 不灭的火种

戊戌变法造成的近世烟云虽然不久就消散了，但是，进化论的命运并不是注定与改良运动共始终的。它的革命意义早已超出了政治改良运动，其生命力又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发扬光大。继起的革命派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运动。

从二十世纪初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之中，我们从当时比较重要的革命者的言论，及革命派的刊物和书籍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由《天演论》造成的风潮的影响。请看：

“吾恐今日瞵其鹰视，张其狼牙，攘臂奋袂，号称雄邦，争我中国者……，盖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今日固势力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

①《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载《民报》第二号，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之自取之也。”①

“故今日者，愿吾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协力，以求为中国之国民，并以播国民之种子。非然者，天演如是其剧，物竞如此其酷，而世界有国民之国，将群起染指于亚洲大陆极东之地。”②

“现在之世界何等世界也？举天下之各民族群起而相竞争，观其谁优谁劣谁胜谁败，以待天演之裁判之世界也……”③

它们不仅把《天演论》中阐释的历史规律作为激励人们救国的武器，而且证明，所谓国家淘汰亦与生物界淘汰一样，具有“天然淘汰”、“人为淘汰”和“阴阳淘汰”的各种“天择”方式④。在《湖北学生界》和革命派机关报《民报》的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那里，这种推导成了革命直接的宣传工具：

“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

①《二十世纪之中国》，载《国民报》，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②《说国民》，载《国民报》，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③杨度《〈游学译编〉叙》，载《国民报》，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④《淘汰篇》，载《大陆》，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旋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抹火庐，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大活动场也。”①

“况列强之殖民于我土地者，已星罗棋布，以最劣之民族与最最优者相竞争，其处必败之势，亦属天演公例。爰是则吾人不可不有以捍救之……。”②

就是在革命派与改良派已成尖锐对立形势的一九〇六年，胡汉民还在《民报》上撰文说：“严氏之所不同于时之革新论者，亦在程度之问题，而不在性质之问题”，并论证严复的进化论译著和政见中，可以直接导出革命派关于“民族革命”和暴力革命的结论③。章太炎在他的学说中，也大用了一番“进化”的概念，认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而革命者的责任，就是

①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②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③参见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

要于进化诸事类中，“择其最合者而倡行之。”①

辛亥革命以后，各种西方时髦的哲学流派都曾在中国的思想领域中流行一时。然而，泛滥的洪水往往朝至暮去，而进化论的种子却在中国的土地里扎下根来，并茁壮成长。目前，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进化的思想是贯串于整个近代哲学的，它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在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上最好的情况便是“达到机械唯物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水平②。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造就的不只是一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它还哺育了新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以及我们党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薰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严复在中国为进化论所做的工作，就是早一辈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准备。从这一点上说，它的影响、价值和生命，早已超出了严复本人的预料；进化论本身和接受了它的那个历史时代，使它成了世纪的产儿。

---

①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②《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13页。

在“五四”的一代青年那里，进化论的学说，不仅成了代替《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内容，而且在新的形势下被大大地发挥和发展了。

一八九八年五月，正当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浙江的绍兴小镇上，一个瘦小的青年离开了他破落的家庭和给他幼小的心灵罩上了层层阴影的故乡，来到南京矿路学堂。就在这时，看新书的风气流行起来，他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他跑到城南书店买来这本书，一读上便爱不释手了：“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他一口气读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责令他读一张报纸，那上面“臣许应骙跪奏……”云云的老一套，比起《天演论》来，对这个饥渴的青年毫无吸引力。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仍然“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馋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这个对《天演论》如此着迷，对赫胥黎、柏拉图感觉如此新鲜的青年人，后来成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就是鲁迅。鲁迅世界观的形

①《鲁迅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琐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成、发展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鲁迅的著作，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眉目”。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对他一生产生的深远影响。

进化论的思想方法，不是简单地给人们一种历史知识的教育，叫人们坐而知往古，徒手于未来。重于“今”和重于“行”，是进化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最明显的思想成果。请看：

“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

“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也”①。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也反复宣传进化论，说“优胜劣败，理无可逃”②。“人类文明之进化，

①李大钊《青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②陈独秀《抵抗力》，《青年》一九一五年。

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① “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② 在《〈新青年〉宣言》中，这种思想更是直接指导了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③

蔡元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中对进化论给以这一代青年的启示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

①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一九一六。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
③《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①

“五四”以后，一代新青年迎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对数千年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当时曾有人感慨：“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②这种科学的精神，评判的态度，正是通过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科学和哲学所给予中国人的，它应被视作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无数纷乱迷惘的思想潮流中搏击而取得的真正可喜的进步。作为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它在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发扬，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宝贵的财富。

毛泽东的一代人诞生在《天演论》译注和问世的那个时代里。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是起义新军中的一名普通列兵。在此之前，他的知识结构中除了幼年上私塾学来的《四书》、《五经》和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外，就是在新学堂里读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他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的政治学说，是得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自学

①《东方杂志》一九一三年第九卷第十号。

②《〈科学与人生观〉序》，载《胡适文选》。

生涯。在那里，他大量阅读了严复翻译的世界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一九一五年，他成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陈独秀、胡适两人在他的心目中取代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地位①。他虽然不一定是《天演论》的直接受惠者，但他思想上必然经历了接受进化论的阶段；在政治上，他成了受《天演论》启蒙那一代人的继承者。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言及中国之不进化的原因，皆起于任其自然。他说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②在这里，虽然他已经把当日社会的进化手段看成是革命，但如果没有进化的观念作基础，是不可能去涉及进化（改造社会）的方式的。正如中国近代没有改良的勇敢尝试在先，革命就不会磅礴

①《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②《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于后一样；这也与鲁迅、陈独秀、毛泽东们的事业不可能产生在十九世纪同理。

历史是有“台阶”的，人类的进步总是拾级而上。这在思想史上尤为明显。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天演论》的翻译传入中国之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已获得了自己完备的体系。但为什么首先传入中国的是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里，除了时代的、阶级的条件外，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基础准备。进化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恩格斯指出：由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理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①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做学问人的所谓正途，历来不是去研究世界上变化万千的事物现象，而是去研究那具有“终极真理”性质的“天道”。在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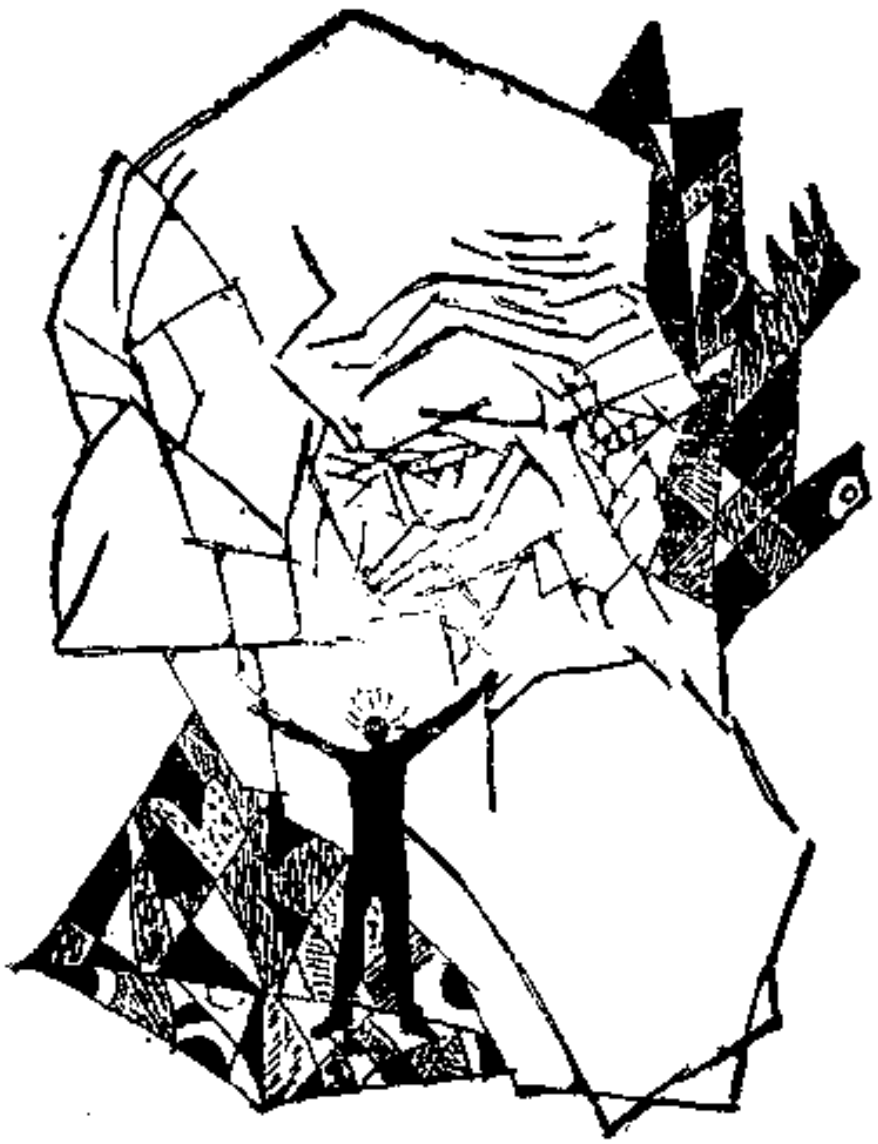
间，流行的则是所谓“抟土为人”、“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①的迷信传说，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传统，但由于科学的落后，它始终没有获得清晰的理论形式。

《天演论》的问世，使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倡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不仅第一次把中国古代的朴素进化论放在了自然科学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复活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新生命，正如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文学说》中说的：“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也。唯物主义昌，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科学盛，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②这就为后来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万物是互相联系、发展变化的，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盗火者的足迹渐渐模糊了，但那颗不灭的火种却日益光大。

①《天演论·导言二·广义》。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二。



第三章

永恒的命题

也许旋涡将把我们冲刷下去，
也许我们将到达幸福的岛屿，
……但在到达终点之前还
有些事情，
一些高尚的工作尚有待完成。
——丁尼生

一切理论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所谓变革，归根到底也就是思维方式的不断更迭、演变。当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实践在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人们感到了机构的沉重、体制的陈旧，终于引出了体制改革的戊戌维新；当维新运动处处受制于人，人们又深感传统思维方式、文化结构的沉重，方法论的落后，希冀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在方法论上有一场伟大变革。

如果有人问："当时有那么多救亡图存的呼吁文章，除旧布新的改革理论，为什么唯独严译《天演论》赢得了划时代的声誉？《天演论》的深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那么，我们请他站到一八九八年去，往回看：尽管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奋起改

革者前仆后继，但他们基本上都局限在传统的方法论上，这就象一个人力图把一只落入陷坑的球推转出来，而他本身却立足在这只球体上一样。怎样才能把这只球推出陷坑呢？阿基米德曾经说："在另一个世界上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移动地球。"改造中国也象推动一个巨大的天体，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力，而且首先需要一个新的支点。《天演论》的魅力和深远意义正在于它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支点，使中国旧世界的批判者们能够站在那个旧世界之外来批判旧世界。这个支点就是崭新的自然科学方法论。

严译《天演论》把生物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这种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办法，是至今给予我们深刻启示的。自然科学影响社会科学有两种模式：把自然科学的一些概念随便搬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这是失败的模式；把自然科学的成果抽象上升为方法论，运用这种新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这是成功的模式。这，也就是严复的道路。

3-1 有共同规律吗？

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严译《天演论》在中国

大地广泛传播，并在戊戌维新和后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思想界一枚广泛流行的“货币”。

但是，由于这一伟大思想在欧洲政治领域产生的某种后果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①，人们对严复在《天演论》中创造性地把生物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行为产生了疑虑。为了表达这种疑虑，人们把《天演论》在中国引起的积极作用看成是某种偶然的客观后果，并认为赫胥黎并不主张自然界与社会有共同规律，严复把持这种观点的斯宾塞的议论引进赫胥黎的《天演论》，只是一种危险的移花接木而已。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命题。

当辩论走下那生动活泼的社会大舞台，拨开教堂烟火造成的迷雾，来到哲学家静寂的书斋时，思辨的任务使人们变成了不徇私情的法官。严复在《天演论》中引进斯宾塞的言论究竟是一种任意杜撰的牵强附会，还是使赫胥黎的思想更加清晰明快，更易使人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究竟能在生物

①达尔文进化论诞生后，许多学派都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其中产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后来的种族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

学、自然科学王国以外的天地里走多远？天演和人治有共同规律吗？每当问题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那个自称为“达尔文的一头猛犬”的赫胥黎。因为，达尔文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关于生物历史的著作运用到生物学以外的领域去。虽然他知道，“这里有一点对上帝的小小的不敬”，也颇感自己“就象一个行将杀人的凶手”①，但他只希望自己的著作将和历来的生物学著作一样，只有一个平淡无奇但不被人唾弃的结果。当达尔文急流勇退的时候，他把战场留给了这个比他更有战斗意志的人。

那么，对此，赫胥黎究竟持什么态度呢？

《天演论》是赫胥黎晚年的著作，是集其毕生研究之成果得出的关于生物进化论的概括性经典论著。象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赫胥黎不但看到了达尔文进化论对于自然科学的贡献，而且充分注意到它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意义。在重刊这篇给牛津大学罗曼尼斯讲座演讲的序言里，他说到：“最近许多年来，由于某些原因，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已经转移

①(美)亨利·托马斯、达纳·李·托马斯著《查理·罗伯特·达尔文》，载《伟大科学家的生活传记》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到近代科学思想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去，而我并不愿意改变我的课题。”虽然，罗曼尼斯基金会举办的讲座设立了一些避免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的戒律，讲演者不得不具备一种“跳鸡蛋舞”①的本领，以避牵涉政治、宗教问题之嫌，但是，赫胥黎并没有让步。他很明确，他“现在要竭力去做到的，就是清除掉那种看来对许多人已证明是障碍的东西，这就是指那种表面上的反论：伦理本性虽然是宇宙本性的产物，但它必然是与产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对抗的”。在赫胥黎看来，认识宇宙过程中的一部分——人类的天性，和正确地把握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②

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最勇敢的捍卫者和最积极的传播者。但是，翻开《物种起源》和《进化论与伦理学》进行比较，我们立即会发现，他对于达尔文的敬佩并没有使他的工作局限在达尔文研究的领域内，也没有使他停留在为达尔文的巨著诠释注疏的水平上，而是创造性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大大发挥

①蒙着眼睛在散布着鸡蛋的地上跳舞，要避免踩着鸡蛋。

②《进化论与伦理学·序言》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

了其内在的真理性，大胆地将它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

《进化论与伦理学》，通篇从地球上生物进化生存斗争的描述入手，进行“人为天演之一境”的论证，又导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但是，由于罗曼尼斯讲座的禁令，这种叙述不能如万里江河那样自由奔腾，一泻汪洋，而只能象小溪般地在布满碎石的山涧里宛转迂回。以致于人们多年来认为赫胥黎主张社会与自然是没有共同规律的。

虽然，赫胥黎也认为，人类社会是在战胜自然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与受自然控制的程度成反比。但人类社会一旦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在家庭与家庭、种族与种族、社会与社会、文明与文明之间，就组成了一种新的“自然”，并在运动中形成自己的规律。这种个体（社会细胞、分子）“适”于全社会规律而存在的现象，与自然界的物种在竞争中“适”于自然条件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观赫氏《进化论与伦理学》全篇，我们不难看出，他肯定人类社会的组成过程（即伦理过程）与自然选择过程有着不同的“原则”（假使有‘原则”存在的话），但这丝毫不能证明赫胥黎是反对“社会与自然有共同规律”的。相

反，演讲中处处证实了这一命题。这里缺少的只是一个逻辑上的中间环节而已。

为要讨论赫胥黎对于“社会与自然有没有共同规律”的看法，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所说的社会与自然的共同规律指的是什么？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二章“生存斗争”中说：“我把每一个有用的微小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一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表明它和人工选择的关系。但是斯宾塞先生所常用的说法‘最适者生存’，更为确切，并且有时是同样的便利。”“我应当先讲明白，我把这个名词（生存斗争）当作广义的和比喻的意义来用的，其意义包含着这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也包含着个体生命的保持，以及它们能否成功地遗留后代。……在这几种彼此相通的意义中，为了便利，我采用了一般的名词——‘生存斗争’。”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所昭示的自然界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所谓把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规律“搬”到社会科学领域里来，便是搬来了这条规律。赫胥黎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明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但

①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版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版第78—80页。

是他对伦理过程的分析，却处处表达了这一思想。

首先，“物竞天择”必然是立足于对“物”的性质的确定之上的。那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事物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呢？请看：

“今天，某些地方繁生的小黄芩，就是那些史前时代到处遗弃燧石工具的野人所践踏过的小黄芩的后代；倘若追溯至远古，它们的祖先在冰川时期的气候条件下可能比现在更为茂盛。与这种下等植物漫长的过去相比，文明人类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①“无疑，可以这样恰当地认为：那种通过我称为的‘园艺过程’来创造并维持园地的人的能力和智力的活动，严格说来，就是宇宙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有肉体、智力和道德观念的人，就好象最没有价值的杂草一样，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纯粹是宇宙过程的产物。这个在已往三十年的初期备受诽谤的道理，我不晓得有谁比我在过去三十年中，更有力地坚持过。”②“蜂群社会则是宇宙过程通过膜翅目类型的组织所造成的蜜蜂技艺的成品。”而“这种社会，是官能上的需

①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2页。

②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8页。

要的直接产物。”① “我看没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在开始的时候，也象蜜蜂的社会一样，是一种官能上的需要的产物。”② 这些思想，严复在《天演论·导言一》的按语中用一句话表达得清清楚楚：“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

人类与自然界事物同属于“物”的性质一经确定，那么，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界事物的生存活动就可以具有相同的“竞”的规律。赫胥黎说道：“能够持续下来的并不是生命形式的这种或那种结合，而是产生宇宙本身的过程，而各种生命形式的结合，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些暂时表现而已。……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某一个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③ 那么人类社会的情形又怎样呢？他以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事件为例：开始殖民地的过程，是“在旧的自然状态范围内，开创了一个新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以及一种新的人群。”他们“小心谨慎地同旧的自然制度相对抗。从整体来看，这个殖民地是引进到这个旧的自然状态中的一个复合单位，此后成

①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17页。
②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18页。
③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3页。

为生存斗争中的一个竞争者，去征服其对手或者被消灭掉。”①群体生活的群蜂组织的产生，只是一种自发性机制的完善化，这种机制是在不断变异的长时期内，经过生存斗争，对单个生活的蜜蜂的子孙后代进行锤炼而产生出来的。“人的家庭的产生所依赖的条件与较低等的动物中进行类似的联合所需的条件是完全相同的。其次，可以很容易看出，家庭结合的持久性的每一步进展，其结果是使其越来越多的子孙后代为保卫和防御而合作，因而使得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家庭比其他的家庭具有明显的优点。就象在群蜂中那样，对家庭成员间生存斗争的逐步限制，提高了对外竞争的效率。”②

物竞是为了能“适”，这里，所适者决不是一种超自然的意志。“作为一种自然过程，具有象从种子发育成为一棵树或从卵发育成为一只家禽那样的性质，进化排除了创世及其他各种超自然的干涉。作为一个固定秩序的体现，其每一阶段都是依据一定规律而起作用的一些原因造成的结果……”③这里每一个个体所要“适”的，就是由他们自身组

①《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11—12页。
②《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18页。
③《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4页。

织而成的整个大自然的运动规律，而这一规律又是因为它们本身运动的需要（所谓“生存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这个谦和的“适”字的背后，布满着激烈斗争的生物和社会的场面；而每一个体的奋斗，可以说都包含着反抗厄运、不甘被淘汰的意志，因而也都具有“与宇宙过程相对抗”的性质。实际上这一切又都包含在这一宇宙过程本身。关于人类社会的伦理过程，看起来是一个反天道而行的过程，因为只有在消除了人的自然性质的地方，才能体现出人的社会性质。但是，人类社会这种自我完善，使自己在自然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响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口号的行动。尽管赫胥黎讲到：“蕴藏于某些人体内的能力，在同样蕴藏的智力的指导下，产生了一批在自然状态中不能产生的物体。”① 但是它却“是宇宙过程通过人的能力和智力产生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只是说，通过人在一部分植物界起作用的宇宙能力，和通过自然状态起作用的同一宇宙能力，是互相对抗的，而且在人工的和自然的东西之间到处都表现出同样的对抗性。即使在自然状态本身，生存

①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1页。

斗争不是在生命领域内宇宙过程的各个不同结果彼此对抗又是什么呢？”① 对于这个重要的反问，事实本身已经包含着肯定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个反问，作者有一条这样的注释：“或许可用更简单的实例来说明。如果一个人用两只手分别抓紧一根绳子的两端，同时使劲想要把绳子拉断，那么右臂所使出的力量必定与左臂的相对抗，但两臂的力量都来自同一源泉。”这已经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所谓与宇宙过程相对抗的伦理过程和与自然整体规律相对抗的个体的运动具有怎样相同的性质。

这个再明了不过的解释，实际上告诉我们“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之间的必然联系。所谓能“适”者，就是能“争胜”者。赫胥黎鼓吹“适者生存”实际上就是号召“与天争胜”。他说：“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在于同它作斗争。”② 著名的桐城学派大师吴汝纶在给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作序时说到：“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

①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第9页。

② 《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8页。

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①吴汝纶一语道破了严译著作中赫胥黎思想的要义。正是由于严复这种成功的"揉合"工作，《天演论》才点燃了当时中国广大读者心中的烈火，几年之中，"卫种"、"救族"之声响遍神州大地。虽然，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和《天演论》中，必不可少地使用了欧洲人征服殖民地的例子，用以说明"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在鼓吹弱肉强食的种族优劣论。它实际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敲响了争取独立自由和主权的警钟。《天演论》之传译于中国所取得的重大革命性影响，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赫胥黎赞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发展、运动有着共同规律，而这一规律并不是"弱肉强食"，而是"与天争胜，适者生存"。②严复不但没有歪曲和篡改赫胥黎原著，而

①吴汝纶《〈天演论〉序》。

②丹皮尔指出："进化论的生物学给予一般思想界的真正教训是：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不断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在与环境不合的方向上走得很远，可能就有某种淘汰去加以制止。"见丹皮尔《科学史》第539页。

且领会了其深刻的立意。他也许并不需要借助斯宾塞的理论，单单是从赫胥黎的原著出发，就可以系统地阐发这一思想。仅仅是为了透彻说明这一理论的逻辑过程，解除由于“跳鸡蛋舞”的需要所造成的迷惑，严复才借助了斯宾塞“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论述。这正如为《天演论》作序的吴汝纶所说：“赫胥黎氏之旨趣，得严子乃益明”；严复的这种创造性的译书方法，显然是“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的①。

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人类摆脱偏见，迈向更复杂的未知世界提供了钥匙。它是继机械论之后又一个挑起哲学革命重任的世纪儿，它的领域远远超出了自然理论认识的天地，而早已踱入了晦暗而迷人的哲学思辨的殿堂。以往，人们在估价达尔文进化论创立的意义和把它运用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时，只注意到它的个别结论对于《创世纪》一类世界预言的革命，即给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本体论带来的革命，而没有看到在它绚丽缤纷的体系中充满着辩证的方法论和这种科学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这种认识上的缺陷，使得许多思考者

①吴汝纶《〈天演论〉序》。

在这座米诺斯牛宫面前，每每会毫不自觉地走上印度古代贤人释迦牟尼和小亚细亚斯多噶先哲们的迷途。而这些崇拜者们心中“偶象”的价值，往往就在这些迷路人们的内心天平上被轻率地估价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没有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真谛。他们把“适者生存”歪曲为“强者生存”，从而抹煞了达尔文进化论中“不同之体有不同之用”的思想，这种理论在人类社会领域的运用，就必然导致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落入了达尔文所极力要人们避免的那叫做“最后之因”的妖艳动人但不生育的魔女的陷井。

历史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合是不可避免的①，社会科学必然要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而严复，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盗火者，不仅成了沟通东西方思想的桥梁，而且用自己创造性的译书方法，建立起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

走在这科学的充满荆棘的崎岖小道上，正如《天演论》末尾那段隽永的诗句所唱的：“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

①列宁在一九一四年曾说：“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强大了。”

将然未然……。”在把进化论的方法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过程中，到处都可能埋藏着致命的陷井，W·C·丹皮尔在《科学史》一书中曾经说过：“每当科学有巨大的进展的时候，每当一新领域被置于自然规律之下的时候，人类心灵由于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新方法的力量，总以为马上就可以对宇宙提出完备的机械解释了。”①许多人纷纷集合于这杆旗帜之下，或贴上这种新产品的标签，以为抓住一种新方法的个别结论，就是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忽略了这种理论的真正精华，即它的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作用，互相激荡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和个别结论随意搬到社会领域，这种嫁接术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苦涩的；另一种是把从自然科学成果中抽象出来的方法论，应用到社会领域，这种结合往往是持久幸福并多子多孙的③。

①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第421页。

②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是持久的、幸福的、多子多孙的，不能与以前那种哲学与神学的错配同日而语。”（《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8页）

那么，严复是怎样进行这种探索的呢？为考察他运用进化论方法论分析社会历史的成果，让我们走出哲学家寂静的书斋，重新置身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大舞台。

3-2 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看待中华民族的独立

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思想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人们从类环境的角度去考察一个事物生存的条件。这也是辩证法最基本的普遍联系的思想。把这个观点运用到人类社会，运用到“舟车大通”之后的国家政治学说中，就是要从世界大势和国与国的联系中去考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兴衰存亡。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十九世纪中期的思想界状况看，那种只知有天朝不知有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凭着自我感觉良好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和闭关自守观念，正是古老封建社会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经济的产物。在几十个世纪里，中国被沙漠和山脉与世界隔绝着；它有着与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巴比仑的楔形文字同样古老、独特而又美丽的文字系统，

但当这些文字在当地已经无人可以辨认的时候，当着西方的文人们从古罗马的灰烬中发现了地中海岸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为之惊异不已的时候，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中国古老圣人的偶像，却连续不断地被中国人民尊奉了几千年；中国虽有着长达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与法兰西、英吉利的土地一样，受着大洋波涛的冲刷，但几千年的“以农立国”的思想，始终是这个帝国的政治思想传统。对于她来说，海上贸易和与各民族的往来，更主要的只有着一种政治上的隶属、臣服与炫耀国威的意义；对于世界来说，她从来都是给予者，以至于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只是一块被山海隔绝的大陆的一隅，而自诩为“天下之中”。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人们曾经发出感叹：东方和西方，似乎是“永远不会相遇的”。

所以，当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渐渐拉开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叩关求通”并没有引起这些妄自尊大的帝国臣民们的兴趣，直到国门不得不被迫开启，人们的思想仍然按习惯上足了发条，在古代的时空观中鸭步鹅行。从大清皇帝硬要西方使者施以中国朝臣的跪拜礼，到地方总督公然捣毁西人设置的电缆、铁路，中国社会的一切旧势力被动员起

来，集合在抗拒世界新潮流的旗帜下。他们守旧恶新，拒洋如仇，“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谓不讲富强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自可以致。”说什么西洋学术皆是中国“古已有之”，“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①鸦片战争二十年后，仍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局势下，第一个把中国的民族存在放到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去考察的，是严复。一八九八年《天演论》的问世，对这个闭塞僵化的社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借生物世界生存竞争的理论，推及人事，得出了“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的结论。

他说：“物力不假人力而自生，便为其地最宜之种……于此所指为最宜者，仅就本土所前有诸种中，标其最宜耳……然使是种与未经前有之新种角，则其胜负之数，其尚能为最宜与否，举不可知矣。大抵四达之地，接壤绵遥，则新种易通，其为物竞，历时较久，聚种亦多。至如岛国孤悬，或其国在内地，有雪岭流沙之限，则其中见种，物竞较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

狭，皆为最宜，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①这正是古老的中华帝国内各民族斗争与新近到来的新的世界民族斗争的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中国在近代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除了帝国主义的东来这一国际条件外，最主要的是，它在自行发展的历史中，没有与真正先进的文明进行过较量。这种闭塞状态使她在近二百年中不了解世界的趋势和各国实力，一旦交锋，便败下阵来，成为近代世界的落伍者。是的，当着中国人发明的用来驱鬼迎神的火药被欧洲人作成轰毁中世纪墙垣的火炮，葡萄牙人、荷兰人借以占据了澳门和台湾时，大明王朝正千辛万苦地修固万里长城，当着西欧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用自然力去发动机器和船只，用望远镜探测太空，并懂得了化学、生物学和医药的秘密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被困在辞章考据学之中，由儒生而步青云的显贵，只会象鹦鹉一样背诵“子曰”、“诗云”等古圣先贤的陈词滥调。“我中国孱卧事群雄之中，

①《天演论·人为按》。

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旧而不能行远。”①这样的国家，在群雄并争的局势出现时，怎么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中华民族要争生存，求独立，就必须对外知大势，对内有凭藉。严复在《天演论·察变》中指出：“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已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由此，他引出了“天已谆谆然命之”的变法理论。这种认识，较之当时一般维新思想家的议论，不能不说是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在面临外族入侵的时候，社会结构往往显示出“同化”的功能，而今天在西洋入寇面前，却会有灭种的危险呢？恩格斯曾经说过，这种斗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一方。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却困扰着中国人。知识界的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也试图找到其中的答案。他们说：“三代以前，皆以中

①康有为《强学会序文》。

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而中国的“无道”表现在中国的“德治”（以德治世）只有“成己”之仁，这种治世之道，较之西洋的“法治”要落后，而在“成物”之知方面，更要相形见绌①。在这里，人们开始冷静地分析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差别了。但是，十九世纪中国的困境，并不是一种暂时的忧虑，而是一种时代的危机；并不是在个别长短较量中的偶然失利，而是在战略局势上处于不利地位。接受过生物进化论的严复，从“环境”的关键作用上指出了这一危机的真正性质。他认为，当时天下正处“日趋混同”之大势，而中国民生“已日形狭隘”。今日中国欲以窳陋之武器抗近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狭隘的民族心理抗生机勃勃的世界主义幻想，在“大势”上就失去了有利地位。如果说，求强，只是争取“地利”的话，那么，开放国门则是争取“天时”了。

因此，严复的变法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开放国

①《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

门，反对排外的基础之上的。在《论教育书》中，他说："若夫徒轩轾于人之间，尊其旧闻，若不可犯者，则亦有之矣，突厥①、埃及②、波斯③、印度④是已。之数国者，夫岂不主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岂不自谓文明？""然而其效则公等所共见而共闻者矣。吾故曰：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其次，严复的救国理论是建筑在使民族国家变法自强的基础之上的。在《原强》中，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万国蒸蒸，大势相遇，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这种开放国

①十九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衰落，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酝酿瓜分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苏丹多次实行改革，以增强国力，但因遭封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直至二十世纪，土仍受英、法等国控制。

②十八世纪后期，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引起了英国干涉。在英国唆使下，一八三九年埃土战争爆发，埃及战败，沦为英法殖民地。

③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伊朗成为英、法、俄的争夺对象。一八〇四年、一八二六年的两次伊俄战争中，伊朗战败，俄、英、奥、法、美先后在伊取得特权，伊朗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④英国殖民主义者十七世纪开始进入印度，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逐渐控制了印度。一七七三年，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十九世纪中期完全吞并了印度。

门，变更旧法的举措虽出于不得已，但“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何？自然之机，必至之势也。”①

在这里，严复是极力主张中国政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的。这两个国家，在西方走向近代化时，都还是封闭的封建专制国家。一六八二年，当彼得就位沙皇时，他发现俄国土地辽阔，但贫穷落后，居民稀少，与西欧很少接触；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没有出海口，因而很少贸易。于是他向荷兰、英国学习造船，确信“欧化”俄国的必要，专心致志地把西欧的习俗风尚引进俄国。此外，还创办学校，培养工程师、航海者和陆军军官，将西方教育引进俄国。彼得从国外聘请了熟练技工，在制造海陆军需品中推动了俄国工业。他在位期间终于打开了“通向西方的窗口”，在芬兰湾头的涅瓦河上，建立了彼得堡城……

东方的邻国日本与俄国稍有不同，它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在一八五三年美国的佩里率舰来到浦贺港以前，它是一个停滞的封建国家。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一直束缚着日本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儒教道德在社会关系中

①《原富·按》。

成了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关系的基础。而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不感兴趣。一八五六年，作为第一任总领事来到日本的美国外交官哈里斯曾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对于任何事情，都遵守“静止的东西，不宜让它活动”这一格言。自一六三六年颁布“锁国令”后的二百年里，除了漂流国外的渔民外，谁也没有去过外国。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在美国人的逼迫下打破了。经过“开港”与“攘夷”两派争论，人们痛切感到本国的落后。通过“还政天皇”的运动，日本实现了明治维新，终于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他们改革制度、扶植产业和创建近代军队，努力提高就学率以普及国民教育，使得作为法治国家的独立意识大大增强。这一切，促进日本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前有波斯、印度覆亡之借鉴，后有日本、俄国变法而强盛之坚盾，这就是严复立论的根据。所以，他说：“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① “宇宙大势，既日趋混同矣，不自其同于

①严复《原强》。

人者而为之，必不可也”①。他的结论是：应该把中国放到世界的潮流中去，放到进步的潮流中去，在这样的潮流中，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把进化论“适者生存”与“人定胜天”的思想巧妙自然地结合起来，避免了重蹈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弱肉强食”的覆辙。

3-3 牛“体”安能有马“用”？

怎样把中国放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去呢？在批判顽固派闭关锁国态度的同时，人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怎样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

改革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和洋务派那里，学西方，无非是学习他们的船坚炮利，“师彼之长，去我之短”②。如练兵、制器、开矿、通商、邮电、交通之类。然而，这一切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①严复《原强》。

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辑。

道德传统将发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大多是没有深思熟虑的。王韬在《易言跋》中说：学西洋，就是以西方的利炮坚船“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也认为：“道”（指封建伦理纲常）是中国的好，“器”（指科学技术）是西方的好，道是本，器是末①。——这代表着洋务运动前期大部分追随者和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水平。对于这种主张，顽固派却敏锐得很。他们认为，“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者为人才之用舍。”“导之以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这样，所谓“以夷制夷”的实际结果将会是“以夷变夏”②。但是，现实社会生存的需要既迫使中国不得不踏上这条“向西行之路”，洋务派就必然需要构造出自圆其说的理论。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于是，这便成了洋务运动的思想旗帜。改良派的康有为，则把西方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的一些皮

①《盛世危言·道器》。

②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辑。

毛，附会于中国孔孟、王黄①及部分佛学经义，构成了其反对专制、提倡民权的“不中不西”的维新理论。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者的方式直接决定着当时政治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在各种见解的分野背后，是中国改革势力中林立的党派。

为此，中国人需要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中国向何处去，不仅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向相联系，而且决定于中国人对这种趋向的理解。正是严复，充当了那一时代“沟通东西”的理论前驱。严复能当此任，不仅因为其“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而且于“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正因为他对中西之学都有较为深刻的研究，所以，他断然提出了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针锋相对的论断。不过，他担心的不是“以夷变夏”，而是“以夏变夷”。他指出：中国至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济。”所谓洋务运动，不过是“反（舍弃）本而图其渐（皮毛）”，不免“淮桔成枳”②。这种改革的成效和

①王夫之、黄宗羲。

②古代传说桔子从南方移到淮河以北种植，果实变得酸涩称为枳。严复用这个成语比喻，海军、船政、铁路、邮电等，在西方本来是富强的基础，而洋务派办起来却腐败而无成效。

结果，往往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①

严复对洋务派的批判之所以较其他人更为切中要害，令人信服，是因为他的观点是建筑在不同之“体”有不同之“用”的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体”与“用”，“道”与“器”的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对互相依存的范畴。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至于“道”与“器”，《易》经《系辞》曾言之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无其器则无其道”②，说明事物的准则也是随其物质结构的变化决定的。在政治领域中，人们所调“道”，就是“道统”，即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儒家传道系统，唐代韩愈作《原道》，确定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正统说。严复的“道”、“器”观，接受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成果，更得益于生物进化论的启迪。在《天演论》的译注和一八九五年的一系列论著中，他分别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

①《原强》。

②《周易外传》卷五。

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源远流分，遂阔然相悬，不可复一。”“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间，而互相为用焉。”①“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②他认为张之洞之说“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因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③这种用中国古代特有的表达方式所阐述的思想，正是现代科学系统论所

①《天演论·广义按》。

②《原强》。

③堂甫墫《论教育书》，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要揭示的课题。社会的组成有如生命之机体，表现出一种为生物所有的功能的配合一体化。社会，是一个比生物机体更为复杂的系统。对比东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初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的分子是相同的，但由于组合方式的差异，逐渐演化成结构不同的社会。由于结构的需要，社会机体内部又产生出新的分子和结构，同时使不适应结构需要和机体发展的部分逐渐蜕化，至于消失。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战线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反映了社会中各种势力及其可能推动社会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向。学术界有人认为，如果墨家学说成为主导一国的理论，东方可能将呈现与现在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但当时社会各种因素的组合所形成的封建大一统国家需要儒、法两家当道，遂使墨家学派逐渐消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需要的是大一统的儒家帝国思想，以及以小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这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其各个部分的关系在形成之后便互为因果。在中国近代，只想把西方的经济基础中生产技术一部分拿到中国社会中来，而不改变社会结构，其结果必定不是中国的社会弊病得到补救，而是这些“舶来品”为这架腐朽的机器所窒息。

对于事物结构的探索，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但是，作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研究，还是近几百年的事。现代工业的兴起，推动着对物质结构、细胞结构、天体结构、地质结构、化学结构的研究。严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体系中，吸取了关于结构的思想，运用到社会领域中来，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正因为严复掌握了这种先进的思想方法，所以他觉得张之洞的理论甚为荒谬。“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滋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①严复还第一个把当时西方社会的先进性概括为“民主”与“科学”两大内容，为新文化运动作了理论的准备。此外，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和《救亡决论》两篇战斗的檄文中，将中西文化政教进行了大量对比。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特点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看到了在中国社会机制中起着巨大稳定作用的中国传统的“教化之非”，即意识形态内容的落后性、腐朽性。当时的严复“宁负

①《论教育书》。

发狂之名，不愿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他大胆揭露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他还指出，以千百年前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的“术”，与以一二人意见强齐亿兆辈之性情的“制”，是桀纣为虐。这与谭嗣同所说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盗，而罔不托之于孔”的论断是一致的。他们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政体自确立以来，就一直依靠着与封建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来维持其稳定。所以，中国的改革，正应从思想解放入手。为此，严复提出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变法理论——开民智。这既是改造国“体”的目的，又是改造国“体”的出发点，继此之后，梁启超那对五四青年影响极深的“新民说”，和五四运动中“改造国民性”的口号，是一脉相承地批判这个旧社会机体的浩大工程。而严氏“开民智”之说，实是这一工程的奠基。

3-4 治“标”还是治“本”？

国体（即社会结构）并非不能改造，这一点是严复得之于进化论的要旨之一。“人择一术……不仅能取其种而进退之，乃能悉变原种，至于不可复识”①。但关键问题在于改造的工夫，必须下在根本上。这个根本，从生物的遗传过程来说，犹如细胞核对于细胞质的作用；从生物的发育过程来说，犹如脊索胚层细胞对于神经系统的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机体来说，兴办教育，改造人的思想是治“本”的工作。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得很透彻：“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②严复在一八九八年《上光绪皇帝万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他说道：“标者在乎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在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废除“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八股制度，从开民智入手而立国之本，乃是改造中国社会的第一步工

①《天演论·人择按》。

②《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

作。而练兵、筹饷、开矿、通铁路、兴商务等，都将依赖于这个“本”，“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

在这里，严复也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作为经验和教训。所谓反面教训，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改革。他说：“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识卑下。故当明嘉隆间，得斐立白第二为之主而大强，通美洲，据南美，而欧洲亦几为所混一……至万历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继体之人，庸喑逸懦，国乃大弱……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当国，精勤二十余年，而国势复振，然而民智未开，终弗善也。故至乾隆五十三年，查理第三亡，而国又大弱”①。这是民智不开，只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典型例子。严复这一思想，纯粹是一种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是与专制制度所需要的愚民政策毫不相容的。任何一种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即使是暴力的、武装的，不论如何轰轰烈烈，如果它并不以开民智为目的，它仍然可能再造一个专制政体。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和平的革命，但它却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任务。所以，严复把明治维新作为正面的经验加以介绍。明治维新的领导

①《天演论·乌托邦按》。

者把增进民众知识、提高士兵的文化水平，看作是国家统一富强、发展近代工业和建造近代军队的重要条件。于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办近代学校，普及教育，不惜一切努力来提高就学率，鼓励私人出资办学，立足于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面貌。一九一二年，日本的就学率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五。在高等教育方面，则采取高薪聘请外国教师和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办法培养学者。在推进改革的事业中，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严复总结道："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①

严复的话，尽管缺乏实施于政治土壤的功力，却不乏理论上的先见之明。请看一八九六年严复对于梁任公的一场争论：

严复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

①《天演论·乌托邦》。

戒之，劝其毋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之论。”①严复告诉他，变法是一件艰巨的事，不象谈的那么容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必须全面顾到才行。梁氏原已认识到这种艰巨性，但出于“对付顽固人物，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的想法，他没有接受严的劝告。据梁说，严还告诉他，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是有它们的悠久的历史背景的：它们的民主政治，植基于两千年前的希腊、罗马时代，日本虽是一个变法成功的实例，但它一则在变法前与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二则有赖于明治维新后的大兴教育以及数十年的缓慢过渡。由于在梁启超这样的维新头面人物的头脑中，当时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对于维新变法曲折性的认识，所以，当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时，改良派只能是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严复关于取法于人的观点，也深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政治上取法于人必须遵循物种在机制上相近者才能相配，而产生良好后代的原则。在

①《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中俄交谊论》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历史、社会条件与俄国相似，所以，中国的改革应“以大彼得之心为心，以大彼得之政为政。”“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由于历史自身的进程，使我们在当时失去了检验严氏理论的可能性。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走“法俄”的道路，但是，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却由于“以俄为师”而大获发展。这其中，不是也很有一番可以探讨的规律吗？

很显然，严复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民主政治，而是承认“泰西君民并主”是一种“美治”。但是，经验和理论都告诉他，变更国体，必须依据进化的原则，不能通过突变来完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变化不是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全民族的思想水平和社会的承受力。它虽不象生物学上的变化那样缓慢，然而也没有捷径可走。“民之可

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这种渐进主义的思想方法使严复背离了当时日益高涨的反清浪潮，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他甚至连立宪也不赞成了。一九〇五年，孙中山与严复会晤于英伦，当讨论到革命之时，严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对此，孙中山发表了极其感慨而令人深思的肺腑之言：“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认为严复的思想是深远的；但每一代人以其有限的生命，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理想所达之地的。在那个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意识到的历史责任行事。孙、严的争论，与当时梁、严的争论一样，道出了思想家与行动家、宣传鼓动家的不同之处。

大凡思想家，其历史责任必在思考，对社会政治历史认识比较深远，他不仅要洞察光明，而且还必须洞察黑暗。严复知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植根于遥远的古代，也知道中国当时存在的种种流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弊都是历史长河中淀积的产物。要清除这些弊病，建设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思想家们可能是思想启蒙运动中最有光彩的领袖（象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那样），但却不是革命中最有声色的统帅。历史在这里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但它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即：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统一问题。依照思想家的愿望使社会实现思想上的过渡，必须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如果政治上过于保守，则会抑制思想上的过渡；如果政治上过于激进，则将完不成思想上的过渡任务而事倍功半。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经幻想的由“哲学家治理国家”的状态，在今天的一些发达国家中早已成为事实。国家机器中精华荟萃的智囊团和庞大的咨询机构，是一切政令的来源，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大脑。而在古代，这一点只是在人们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挫折后才模糊地认识到，并摸索着在政治上加以调节的。汉初的“无为而治”的经验，得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专制集权国家——秦——覆亡的教训，它第一次以重大的代价找到了调节封建大一统国家内部动

乱，使社会从失去平衡的状态中恢复生气的方法。政治上采用“黄老之术”，实际上适应着百家争鸣向封建大一统的过渡。这个问题，当时由严复等人提了出来，但严复并不可能解决。后来，孙中山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终于看到了在“军政”过后需要通过一个“训政”的时期，才能进入“宪政”，可以说还是亡羊补牢之举。

括而论之，严复在与洋务派的“体”“用”争论中，与维新派的“标”“本”争论中，和与革命派的“缓”“急”争论中，都运用了达尔文进化论所给予他的启示。这是他与当时任何一个思想家所不同的特点——他在尝试着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使社会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在政治上，严复的渐进主义，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走一条思想解放的道路，它是一条把目光放在千百万人的觉醒、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上的，带有浓厚“民主”色彩的道路。但是，由于它没有一个锐利的前锋，所以历史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向前发展。不过，以此来断言严复的思想是“反动的”，却未免过于武断。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展示了更加清晰的面目，今天更可以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了。历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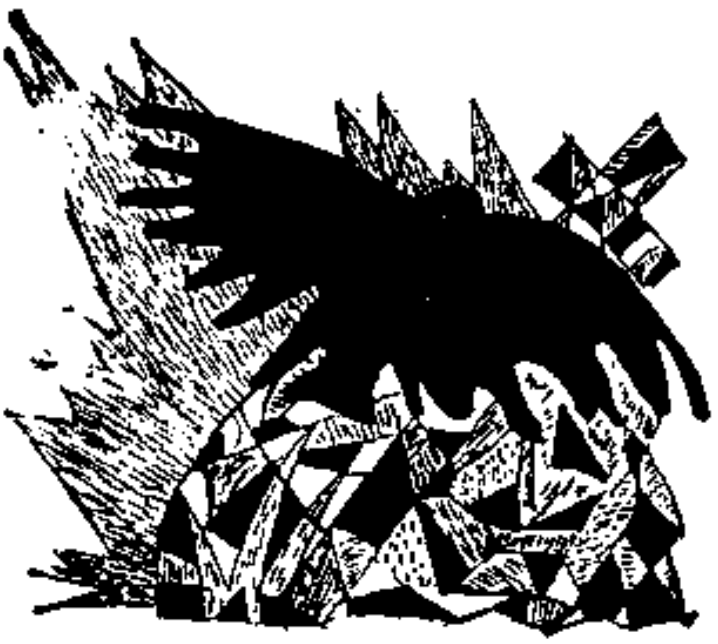
所以没有选择严复的道路，是因为当时所面临的特殊的民族矛盾，是因为当时社会所处的总危机，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超快节奏：在中国，从重商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仅用了十年就走过了欧洲几乎一个世纪（十六——十七世纪）经历的过程。当时，有许多人上午刚刚接受了改良主义的启蒙，下午就参加了革命党。十年前倡言流血革命的人，十年后成了帝制的拥护者和封建军阀……

从戊戌维新到今天，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历史在铁与血的搏斗中且演且进，革命的浪潮一个接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但是，在这块付出了鲜血，付出了生命，也付出了时间的土地上，封建主义的幽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徘徊在它的上空，那种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早已为人们所唾弃的愚昧和迷信的狂热冲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顽强地复活，——这一切，使我们在面对前辈思想启蒙者的艰苦探索时，不能不倍感亲切。

应该肯定，在当时，改良派的确有某些地方比革命派更有远见，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大量思想启蒙工作。直到五四以前，这始终是他们的阵地。即使是严复单凭个人的力量所做的一点工作，也比那时

潮水般泛滥的政治口号更有生命力。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的慷慨陈词和众多的治国方略，很快地变成了反革命利用的伪装；而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近代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依然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青年。虽然严复个人后来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回到了孔孟之道，但他播下的种子，经过十年风雨和青年心田的养育，已长成不可摇撼的大树。由此看来，严复的思想生命比他的政治生命更长，其意义已超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严复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那一时代思想家的忧虑中找到行动家的缺陷，找到历史的失足之处；从他们的预言中看到一系列历史结果的必然联系，从教训的苦果中获得经验的谷粒。



第四章

摇篮与墓地

一棵老树的破裂，就是对新生的树的号召。每一个世纪都有它的使命……

——雨果

摄严氏一生活动之镜头，他曾远涉重洋探求西学，痛陈危亡大倡革新，背流而驻专心教育，抱残守缺拥戴皇帝。他的一生，在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上，都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因而他用毕生心血书写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历史，而是那一时代无数知识分子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悲剧。

4-1 暮色笼罩，送来哀思

严复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维新思想家，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当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戊戌政变

发生，他依旧做着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虽然，他对六君子的牺牲和光绪皇帝的被囚无限愤慨，也曾与唐才常一起组织过自立军的“国会”，但他始终未赞成过暴力的斗争。对于辛亥革命，严复持自己“渐进”的一贯态度，是反对走这样激进的道路的。他仍然坚持要用“西学”来“癒愚”。他说，“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癒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将犹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而他认为提倡西学，最主要的应从自然科学入手。这不仅因为自然科学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且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科学方法的锻炼，才有平稳切实的社会科学及政论文字，“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正“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① 他的这种思想，与戊戌变法前相比已经有了变化。那时，严复既提倡“尊民叛君”的民主，又提倡“尊今叛古”的西学，并主张民主与科学并重，而这时却逐渐只谈科学不谈民主了。他

① 《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认为，当日流行的革命口号，其实谈不上什么民主内容，只不过是一种宗法社会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①

一九一三年，就是这个过去"宁负发狂之名"，对"六经五子亦皆有难辞"的严复，带头列名，发起成立了孔教会。这是他抛弃"西学"这一面旗帜的标志。他一反戊戌变法时期那种反孔姿态，甚至连辛亥革命时期那种坚持"科学"的立场也没有了。他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孔子为中国救主"。一九一四年，他看到卫西琴所著《中国教育议》中有赞美孔子的话，就引为同道，将全书翻译出来，说难得卫西琴"以异族殊化，居数千载之后"，竟如此推崇孔子，若得其用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更使他坚信孔孟之道的合理性，说什么"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

① 《社会通诠》万有文库本135—136页。

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又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取吾言，可待验也。”①正因为他的这种复古思想，使他对后来的“五四”民主运动也极为反感：“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这时，他不仅对当年开士人干政之风的戊戌变法加以否定，就是对自己早年那些辉煌的译著，他也流露出虚无态度，怪自己从前出版《天演论》时立论过猛，“生平浪得虚名”。在死前，他青壮年时代那种“匡济天下”的热情和锋芒更已完全消蚀，宏伟的志向代之以“独善其身”的虚无追求。在忆及自己的师友时，他认为，其“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无闲言者”，只有郭嵩焘、吴汝纶等。活着的朋友中，他最敬佩的是陈宝琛、陈三立和戊戌维新前与他一起创办通艺学堂的张元济，说这几个人“各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

①《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中，行检一无可议。”那个对《天演论》颇不满意，又游于张之洞门下的辜鸿铭，严复因为他精通西学却好复古，所以为他辩护：“辜鸿铭议论稍为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极以为然。”对于康有为，更是引为晚年知己，说自己“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①

当他手中“西学”的旗帜刚刚放倒，接着降临的，便是帝制复辟的幽灵。一九一五年，一些辛亥革命的“变节元老”和“国学大师”们发起成立筹安会，严复随即成了袁世凯幕中政客，从此“顿失天下清望”。在《庸言报》上，他撰文说：“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直可忧耳。”“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虽然，他心中深深感到袁世凯实“非其选尔”，认为他“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

①《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光。”①但是，他只可能越来越多地做他“违心”的事了。

在给子女们的遗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和他们那个时代作出了最后估价：

“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②

——严复的后半生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看到，这里声声唱出的，决不是他个人的哀歌，也不仅是与他一同诞生的那个思想派别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4-2 伟大而沉重的包袱：专制—孔孟—民族的关系

从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到一个“反动顽固的瘪嘴老人”，学者们把这两个截然对立的感觉形象之间的时间与逻辑的过渡，称之为“转变”过程，又为这种转变找出了许多原因。有

①《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②《愈壄老人疾书》。

的把它归之于改良派的反动性，有的则归之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的说是孔孟之道的毒害，有的则从进化论中找到了根据；有的看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有的又说是中国封建主义阴魂不散。自然，一个思想的形成，是无数内界外界复杂因素的结合，人们也可以为它找出千百条理由。但是，一旦把这些理由单独地上升到唯一理由时，它就显得太不重要了。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而只想对当时年轻的中国知识界的忧虑和彷徨的状况，作一个简单的剖析。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自尊心遭到最惨重戕害的黑暗时代里，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并没有给必将揭开新时代序幕的革命留下任何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中国民族精神的火种，却被这开创新时代的必然承担者保存下来。那时，在这些热血青年的思想的天空里，充满着暴风雨前夕各种风潮的格斗，那里存在的不是一条条简明清晰的真理，而是一对对赤裸裸的矛盾：你要想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自尊吗？你就得向打你的“老师”低首下心地学习；你要想中国强大起来吗？你首先得把那个大清王朝统一的秩序打得粉碎；你要想除旧布新吗？伴随而来的

却只能是“治”与“乱”的选择；你说你代表的是一种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吗？偏偏那种西方神话产生出来的是一些“杀人利己”的禽兽；你说你要民主，你所站立的出发点却是民族；你要保种，就必须保教，要保教就必须取消对旧世界的批判……

戊戌维新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经过了它积蓄力量的时代，成为奔腾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历史行程中的思想主流。曾经走在前面的改良启蒙思想家们在这一激荡迅猛的潮流中被冲刷到岸边。从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为要反对暴力革命，抵制共和，他们一步步地背离自己原来的目标，与原来那股腐朽的浊流混为一体。不仅这个学贯中西的维新思想家、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膜拜在马基雅维里① 的脚下；那个蜚声一时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参加了张勋复辟的丑剧和孔教会的活动。他们终于成了历史博物馆里的古董。

分析这一批思想前驱们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为“民族”所牺牲。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①中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著有《君主论》（一译《霸术》）。他的主张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始终占着突出的地位。中国人被迫拿起西学的武器开始完全是出于抵抗外来侵略的需要。“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就使学习西方的“民主”运动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那些倡导革新的人士也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不完全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一登上政治舞台，就不得不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亡国灭种的危局，从而一开始就把富于资产阶级个性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帜换成“保国”、“主权”的旗帜。而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要维持民族的主权完整状态，除了维持旧式的专制政体，暂时还别无所托。黑格尔在谈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时说：“这本书时常被人认为是满纸邪说，徒为虐政张目……殊不知这位作者实在深刻地意识到当时有一个‘国家’的必要”①。在中国，虽然封建专制制度在社会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后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外来的强盗已侵临家门的时候，保全这个国家的完整性不能不是一种权宜之策。严复在《辟韩》中说：“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

①《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中文版。

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①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临的也是同一情况，它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有力的实体，从这个意义来考虑，他们没有把观念上的设立国会论放在重要地位。”②一八九〇年，天皇亲颁的“教育敕语”规定：“国家、天皇和道德的根源已成一体，应以对天皇忠、对父母孝为道德的根本。”但是，他们同时也认识到，不能只限于政府少数人的专制，而必须能够吸取国民所具有的活力。因此，日本才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勉强摆脱它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环境。在日清、日俄两次小国对大国的战争中，表现了它的顽强和生气。

就是在辛亥革命前，曾与严复就《社会通诠》展开了白刃交锋的章太炎，辛亥革命后，也在不赞成代议民主制的问题上与严复走到了一起。因为怕民主使中国四分五裂，便宁愿“强有力的人”出来力行专制，以使国家强盛，外御侵略，从而对袁世凯大抱幻想。对袁的上台，章在主观上出了力，严在客观上帮了忙。一个倾心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者和一个具有乡土农村气质的民族化捍卫者，

①《严复诗文选注》。

②(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居然如此殊途同途①，岂是偶然！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超稳定系统的改革，总是以社会大动乱为前提的②。但动乱危及人民生存的基本要求，使人民必须在毫无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选择社会的前景。这种选择，往往不是在“新”与“旧”之间进行，而是在“乱”与“治”之间进行。历史是人民普遍心理的记录，而这时它的天平向哪一边移动，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这一次，亡国灭种的危险代替了大动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占了突出的地位，这就使得民主运动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严复在一八九五年《上光绪皇帝万言书》中就说过：“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以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当时的改革志士正是这样常常奔命于“标”“本”之间：一方面，要在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面前孤军突进，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其势汹汹的外敌入

①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②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

侵；一方面要保种，另一方面要保教，——这就使他们必然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自身矛盾中。

在西欧，专制政体是“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中一个合乎逻辑的环节。它摧毁了封建制度，招来了民主政治。它又与扩大贸易、古典学术、战斗的宗教以及民族感情紧密联系起来。”①在日本，“封建制度创造了构成近代国家的基础的财产。”日本在德川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有了通用的语言。它的太平、停滞和孤立的二百六十年，给日本创造了“社会资本”。“德川时代的统治制度已经形成了有助于构成近代国家基础的一些财产，武士阶级作为一个实行统治的阶级积累了经验，这便形成了一种官吏制度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组织能力的人材。……特别是十九世纪初叶，在预感到外国威胁的情况下，大批创建的藩立学校……这就使担任明治维新领导者的下级武士得以登上政治舞台。”②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象西欧那样应运而生的专制制度，也不具备在它的保护下酝酿成熟

①〔美〕海斯等《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五年版。

②《激荡的百年史》。

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如此稚嫩，而专制制度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资产阶级的晚出与它的不自觉性、被迫性，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不能形成如日本的武士阶层一样的团结一致的力量。它不是在要不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上争执，而是在用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互相嘶咬。革命的失败，它们是不得不分别承担其历史责任的。

辛亥革命后，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一批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转向反动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在欧洲发生的那场“亘古未有之血战”。这场战争，吞噬了地球上成千上万的生灵，使价值亿兆的人类财富化为乌有；妇女和儿童在饥饿、疾病和暴行的死亡线上挣扎；冶炼业和化学工业制造的钢铁和炸药在毁灭着人类的美丽的家园，——人类历史上这个空前未有的惨剧，第一次揭开了掩藏在“繁荣”、“科学”、“人道”文明面具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张面孔。中国这批虔心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感到，科学并不能保证给人们带来和平、幸福与安宁。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上正式宣告“科学”二字“破产”了，严复也在这时失去了对于西方文明的最后热情。他说：“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

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这一信仰的破灭，虽然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信仰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于这个尚以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民族来说，却丧失了与传统思想进行斗争的唯一武器。

从科学的角度看，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是辩证的。结构决定着功能，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结构，而功能作为二者间相对敏感的因素，对于外界环境条件变化的反映，是可以经常作用于结构的。如果说，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向，是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结构的功能的反映，那么，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外界环境的巨变，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又将反作用于当时的社会。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潮流，正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外因）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外因转化为内因）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倾向。这种倾向促成了两个因素的发生：一种是反动的复古潮流的发生；另一种是开始寻找新的希望的探索，即五四

①《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新文化运动。不幸的是，那一批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介绍科学武器的人，在这个转折关头，堕入了前一种潮流，站在了后者的对立面。这一转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从个人来说，他们已离开了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春年华；作为一代人来说，他们已完成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个阶段。

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形成和大一统国家巩固、发展的历史，以及孔孟儒学上升为统治思想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专制制度下的大一统国家与孔孟之道的不解之缘。所以，从历史的必然性看，回到“专制”也就意味着回到“孔孟”。这中间的关系是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结构特点相联系的。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历来是与伦理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谓家族式的伦理关系是一切政治原则的基础。君权是父权的扩大，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长，维护这个专制君主绝对权威的，是把这一统治关系神圣化的孔孟之道。

在丢弃“西学”的旗帜后，为什么会回到孔孟的怀抱？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新的思想真空出现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种新学说堪与这种久经考验的儒家学说对

垒，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象儒学那样如此深刻地溶化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血液中。

众所周知，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孔子被封为“褒成宣尼公”以来，孔孟之道就开始了它在学术、思想界漫长的统治时代。就孔子思想而言，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典章文物和思想意识）的集中反映。它从政治、哲学、教育三大体系出发，引申出历史观、伦理观、教育心理学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对体育、音乐方面的论述和实践。这使它成为后来封建意识形态的“母本”。其包罗之宏幅、涉及学科之多、深入社会之广，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维系自己王朝的需要，它更是被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四书》、《五经》是那个社会中幼儿启蒙教育的蓝本，《大学》、《中庸》是知识分子进仕的敲门砖。它不仅是知识的化身，而且具有宗教偶像的意义。严复一九〇六年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所作的题为《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讲中说：“往自尧舜禹汤文武，立之民极，至孔子而集其大成，而天理人伦，以其所垂训者为无以易……虽其中不敢谓于宇宙真理，不无离合，然其所传，大抵皆本

数千年之阅历而立之公例。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乃自西学乍兴，今之少年，觉古人之智，尚有所未知，又以号为守先者，往往有末流之弊，乃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然而废其旧矣，新者又未立也。……”①

相形之下，孔孟儒学较之于舶来的西学，虽然已失去“天时”，却还占着“地利”和“人和”。它的敌人们是一个如此年轻的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处于一个空前动荡的年代和一个社会政治斗争急剧变更的舞台，所以，他们来不及用中国的语言构造出任何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就必须投入迫切等待着他们的现实政治的残酷斗争。他们的思想，也只得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时学得的科学知识，矛盾错杂地向前发展或向后倒退，最后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轨道。

当然，在所谓思想真空出现的时候，并非只有孔孟之道才是唯一的栖身之地，也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了苦闷彷徨后都回到了孔孟。但是，

①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

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批奋起反抗孔孟儒学的知识分子中，①大多数难以脱逃这一劫数。这一道路的终点，是由他们的起点决定的。

首先，他们从小就在孔孟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吸取养料，他们所认识的每一个字都渗透着它的教义，这是他们日后回到孔孟的前提。如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都是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康氏祖上就以“专倡程朱理学”著称，康氏自幼就抱定志向讲求“圣贤之学”，故有“圣人为”之称。梁启超十岁中秀才，十二岁考入书院治帖括之学，十七岁中举人。严复六岁随五叔严厚甫读书习字，十一岁从宿儒黄少岩学习四书五经。当着严复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而名列福州船政学堂考生榜首之时，孙中山才刚刚出生。这一点说明，早期的启蒙者与后来的革命者具有着十分不同的人生起点。

在那一批人里，不论他们曾经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对旧社会的思想体系施之以批判，但是，他们

①根据丁伟志《论近代中国反孔思潮的兴起》的观点，近代反孔思潮并非起自太平天国运动，也不是开端于洋务运动，而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洋务运动未雨绸缪，至戊戌变法前后终成轩然大波。（见《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2期）。

的心理上都深以熟知子史经义为荣耀：如王锡蕃推荐严复时，没有忘记写他“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而梁启超也深以康氏学说的“拉杂失伦”、“汲而易竭”为遗憾。就是在以“革命派”的身份出现的章太炎那里，他与严复辩论时，也没有忘记指责严氏的“中学”造诣并非如他的崇拜者描述的那样深，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敌手的轻视①。

另一方面，早期启蒙思想家反抗孔孟思想，常常不是因为被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思想启蒙（除严复外），而大多数以爱国为出发点。这种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是近代一切反抗封建制度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争的失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触发点的根本原因。请看，康有为等“上皇帝书第二”开卷即云：“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代请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项，此外尚有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举国廷诤，都人惶恐……”②梁启超在

①见《社会通诠商兑》.

②载《晚清文选》下.

《变法通议》中举“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作为法非变不可的例证。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批判中国封建思想的“好古忽今”、“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安于朴鄙顓蒙”、“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正是有感于“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至焚毁宫阙”以及“俄法英德，旁午调集”、“强邻环视，刀俎鱼肉，任其取携”，中国已入“瞻乌爰止”①之境地而发的。在《救亡决论》中，他说“即富强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②

然而，这种爱国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没有料到，孔孟之道与这个民族，与这个国家，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已结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整体，——连他们这种爱国热情也是受孔孟之道长期熏陶的结果。在《有如三保》中，严复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夫人生于一群之中，犹大质之一点，其为力本微。昌言驾说，犯天下之所不喜，被讥弹，蒙谤

①《严复诗文选注》.

②《严复诗文选注》.

议，甚且危身亡躯，是亦可以已矣。而犹强聒不舍者，盖其心以为民之于国，犹子之事父母也。孔子不云乎：‘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此其被讥弹，蒙谤议，甚且危身亡躯而不见可悔者，守孔子之道而不敢叛云尔。”①因此，他们常常是凭着年轻的热情和反抗的勇气，以儒家体系的一部分来批判这个体系的另一部分。这样，到了晚年，热情消失了，理论武器依然不强硬，便不得不向孔孟之道缴械。

总而言之，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几乎没有可能去完整地清理、批判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第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导致了强控制状态，不可能对意识形态进行自由探讨。此时，虽然超稳定系统已开始瓦解，但尚不可能形成学派，各种探索无法汇聚成流；第二，政治动乱使系统的理论工作失去了客观条件。这时候，渺小的个人皈依于它，犹如自由落体面对着强大的地球引力——儒学，既是养育他们的摇篮，又是埋葬他们的墓地。

严复是接受过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

①《严复诗文选注》。

洗礼的。何以这样一个人也会走上这个“无端之环”，而不能始终以一种崭新的眼光来批判中国的传统呢？要真正解开严复的转变之谜，就不能不深刻理解“转变后”的严复。

当我们读到严复一九一四年所写的《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一文，就会发现，严复此时虽发表了大量极力吹捧孔子和指责西学的言论，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当年顽固派的论调。在他这时的言论中，有几个观点鲜明地表现出来：

首先，他主张不要盲目地学习西方，基点在于引起人们对于保持中国的民族性的重视。

当年，为了替变法维新制造舆论，他曾经在一系列的论文中做过中西文化和中西社会的对比工作。如，在《论世变之亟》中，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在《原强》中，他说：“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

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夫西洋之于学……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在《救亡决论》中，他说：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心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总之，西方被描绘成一片充满理想、道德、智慧的乐土，所以“中国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①。但是，到他译卫西琴著作时，他作出了与前者颇为矛盾的相反论断。他指斥那种凡“谓事出外国，无论何等，甚至外人之所自非，皆当奉若神明”的行为；对中国教育中那种教会学校“喧宾夺主之事”，发出了“宜听其长此终古否耶？”的疑问。在印度，在日本，由于一味地崇洋，“纯用他人学术，利少害多”，使他意识到，

①《原强》。

中国决不能蹈其覆辙。他说：瓦雷史学士“将死之言，尤足发人深省。其言曰：今此吾人所居之社会，由趾溯颠，所谓通体朽腐也。……盖振古暨兹，未尝有今日之不善。数百年来，其权力固大进也，而但进于支配形气，莽然不知其所终，栩然不知其所为用。民生口体形骸之奉养，嗜欲利便之发舒，事变日新，大异古昔矣。然而课其终效，大抵皆成于恶，而不成于善者也。”①严复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关系中华民族“国魂”的大事。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他的目光更敏锐了。他相信“欧洲之真先进，其能以问学术艺为国民之导师者，则莫不瞭然知保存国种特性，为教育之一大事。……宣达国魂，导扬种性……俾受教育者渐成独至之材”。而如果一味只知效法西方，“故虽极意步趋欧美，终是瞠居其后，不能与欧美比肩，而为一等之强国也。”同样，如果不知道发掘自己民族特性中先进的东西，那就“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躠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失其本性未有能久存者也。”因此，他认为，“此后中国国命，纯系教育问题……且所谓问

①《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载《严几道文钞》二.（本节引语均出于此）

题，非指泛常教育而言，乃问中国此后教育，能否自成系统。”

这时，我们感到，作为一个东西流冲突中最勇猛的弄潮儿，一个对东西流冲突、结合探索了一生的思想家，严复已经成熟了。他的这些观察与思索，决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复古派，也不是当年顽固派的翻版。作为后人，我们虽然可以指出其前后矛盾，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去总结这种矛盾的意义。一个十分简单的真理是：在清朝政府的一统专制未打破之前，在八股取士、孔孟之道“牢笼天下”的时代，如果没有一种极大的勇敢和热情（这其中必不可少地要带有年轻的稚气和思想的片面性），如果没有矫枉过正的决心，要打开局面，引进西方先进的文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随着清朝政府的被推翻，西学形形色色的各种流派潮水般地在中国思想界这块新辟的土壤上泛滥时，中国思想界的任务就不再是“破把持之局”的大轰大嗡，而是鉴别和消化西方文明的问题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政治日益暴露出其残酷本质的时候，这种退却是合乎逻辑的。问题只在于，他的退却一直退到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他又成为自己学生们（指受进化论熏陶，继承了思想解放运动传统的后

来者）的合乎逻辑的批判对象。

严复没有简单地充当复古派的另一证明在于，他此时也并不是一概地摈弃外来学说，而是一分为二地对待。在教育思想上，他给人们描绘了一幅中西合璧的理想图景。在重重抨击了西方社会“饰博爱为伪，以掩其自为之私”和西方教育“致少年人有物质功利思想，而无灵魂，感情赏会全不发生”的弊害之后，又说：“且吾党，之为此言，又非鼓排外之风。”“自重之风，诚异于自满假，惟自满假，昔之中国，所由以物质文明让欧洲而不并进耳。”他十分清楚，“今日欲为独立教育之统系，要不能不求助于欧洲最新之法”，“中国教育家乎，苟欲用国力于至当之地，计惟有取助他山，以建立此不倚之统系耳。”下面，就是其取他山之石，以造就中西合璧教育体系的图景：

“中国于神明之学至足，而所短者在物质之新知，欧美于物质之学过多，而所少者在神明之要道。”东西方文明的这种差别，决定着东西方社会各自的优越和弊病。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西方社会精神空虚、信仰危机的问题已逐渐显露，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开始寻找解脱这一危机的精神武器，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严复当时已敏

锐地洞察到："总之泰西今日之社会，其沦于实丧者至深，是以法国心理学家白格森一日在伦敦心理学会言曰：'向使欧洲三百年间，移其所蔑讨于物质者存之于心理，又使向所称之刻白尔加理辽奈端①诸公，而皆为神明之矩子，今日社会当为何如？'此其言可长思也。孔子老聃者，心理学之刻白尔加理辽与奈端也……。"所以，中国人"欲增长物质权力，必以保爱内力为之基，而欲保爱内力，则必用西人生理之所发明，加以解析，使旧有智慧，见诸实施"。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教育家是蒙特苏里，其教育法是一种"本官觉而为心灵之发达，由心灵之发达而为德行之成就"的学说。而中国孔子的教育思想核心是"其全果乃结于自成，而所谓自成者，必合于成己之仁，成物之智而为之，夫而后为圆满耳。"蒙氏的学术，表达了欧洲教育思想的要点，它遵循着"自外以为内"的程序，以达到知识与道德的结果。而孔子教育思想，是由"自内以及外"来实现其道德和智识的目的。严复认为"中国后此之国本，须向术业与成就人才中讨消息矣。"《中庸》说过："能尽人之性，则能尽

①指哥白尼、伽俐略、牛顿。

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按照这种规律改造中国的教育，就能达到人类社会完善自身的目的，——这种理想社会和理想教育，其合理性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认为，从总的来说，严复的晚年，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正如一个果实，成熟了，等待着它的便是腐烂。但是，任何一颗真正的果实，在腐烂的时候都将留下它珍贵的种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严复虽然还没有能自觉地扬弃儒学，他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的新动向，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一个受过西方文明系统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达到了自己可能达到的最高点。如果说，严复一生活动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系统地介绍西学——找到了一个支点的话，那么，严复一生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他找到了东西方文明的症结。在这种冲突中，他看到了它们结合的必然性，在其结合中又看到了消化的艰巨性，并最终立足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土地上。虽然，属于他们那一代的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他们曾经如此生动的形象渐渐地与那灰色的天幕溶于一片，但在这高高的天幕上，我们仍然能找到一双洞察了光明与黑暗的眼睛。

4-3 从历史的灰尘中发掘历史的主题

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过去时，严复等一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相继离开了他们的人生舞台。这一批人的去逝，预示着思想界新的时代的到来①。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践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在东方的崛起所代替。而昔日资产阶级在大战中失去武器的彷徨、苦闷已为全社会普遍的新的激动所代替。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在西方找到了另一个武器，它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实践检验，开始了在东方的历史。这一事件，把中国整个百余年的近代史划为了两个阶段，分别标志着西方不同流派的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两种影响。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

①根据库恩"科学革命论"的观点，这种革命往往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转换而实现。

的一派人物。”① 他们“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② 这是对那一时代的人们及一生活动最凝练的总结。然而，这些人们所留给历史的，除了他们赋予那个时代的不朽馈赠和作为历史演进的必要环节外，还有什么可以惠及子孙的财富呢？面对他们黑暗的晚年，人们往往背过脸去，把痛惜与同情的目光投向新的天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教给我们应去认识它的价值。

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西方当时最先进的思潮和运动中找到它的原型。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在东西流冲突结合中，在文明日趋混一的时代里，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遗产，以及应该怎样对待外来文明？这个问题，由严复（通过他的翻译工作）提了出来。他用自己毕生的探索，所得出的仍然只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善于吸收与融合外来民族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文化的文明则兴旺，则久存。有如古代希腊、罗马、中国，近代的日本与美国。但这种融合又必须是各国自己的民族精神与外来先进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一个民族，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不得不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否则就只有被同化和亡国灭种的前途。中华民族有她伟大的地方，不然就无以理解为什么在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都湮灭了之后，独有她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又有她沉重的包袱，这使得她在近代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中落伍。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之消化》的文章，其中就分析了各种文明互相影响的关系及"消化"外来文明之必要。他说："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可知，这在当日，已是先进知识分子热衷的话题。但是，由于那一代人过分热衷于吸收新鲜事物，忘记或忽视了另一同样意义重大的工作——打开中华民族身上的包袱，清理其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至于他们在泼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也一同泼掉了。

中国近代的思想界娩若这样一个海湾：当潮水涌来时，满潮的海面上似乎到处都是通道；当潮水退去时，到处都呈现歧路。在接受西学时，西方被看作上帝的伊甸园，在抛弃西学时，西方又成了魔鬼主宰的杀人场。这种思想方法的错误，使自己陷于一个无端循环的圆圈，只能在两极之间摇摆，而不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驾驭时代潮流的目的。

因此，为要能融合东西方文明，首先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明；为要能正确地对待西方文明，首先要能够科学地对待中国自己传统的文明。文明，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和各民族创造的独特的文明，都有自己诞生、发展、进化的过程和条件。进化论的科学方法论，教给了人们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的方法，而具体的历史态度在于告诫人们不要简单的否定，同时也反对一切迷信。没有这种精神，最彻底的叛逆者和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之间，最坚定的信仰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就只有一步之隔。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过了漫长的阵痛时代，又克服了十年内乱闭关锁国带来的萧条，开始了在一条崭新道路上的探

索。当我们再一次开放国门，拥进世界怀抱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的风云更加激荡。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扫荡、被高度工业化后遗症胁迫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注目于东方。他们已经不是对一种古老而陌生的文明投去好奇和欣赏的目光，而是对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民族的创造性寄予希望。这就使我们中国人面临的双重任务（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和总结自己）更加突出、更加紧迫，而且更加义不容辞。

然而，世界的前途是否真如当年瓦雷史先生所云，“取以为今日欧美社会之治疗者……则皆中国之旧物”？或比如严复所预言：“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世界历史的航船究竟驶向何方？这一切需要我们的实践来回答。而此中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只能等我们把这个世界的新的矛盾和新的前途托付给我们的后人时，由他们去评价。

一位划时代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文明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经过漫长岁月的运行已经来到了西方。感谢他为我们指出了世界文明运动的规律，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齐头并进的，而是以民族为单位，不断地为世界历

史开拓道路的过程。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去厌恶自己祖国的落后，而一切步西方的后尘。当代青年，是新世纪的产儿，是跨世纪的一代，我们的使命是创造未来！我们应当为社会主义新型制度的伟大创造而感到兴奋；我们应当为在一百年前开始起步的大时代的变革，将在我们这一代走向更高的高峰而感到骄傲；我们应当为我们的一生将献给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献给为此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而感到幸福。有志气的中国人将再次举起那代表人类理想、智慧和创造力的文明的太阳，让她又回到那曾经是她升起的地方——东方。

走向未来丛书

人的发现	0.81元
增长的极限	0 87元
激动人心的年代	1.03元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1.07元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0.89元
现实与选择	0.95元
经济控制论	0.99元
探险与世界	0.95元
看不见的手	1.03元
语言学和现代科学	0.86元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0.74元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0.91元

*　　*　　*

人的现代化	元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元
没有极限的增长	元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元
在国际舞台上	元
昨天　今天　明天	元
摇篮与墓地	元
择优分配原理	元
第三次数学危机	元
凯恩斯革命	元
艺术魅力的探寻	元
西方文官系统	元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	元
新的综合	元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封底